

中国佛教考古学的调查、发掘与研究

龚国强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经过汉至三国两晋时期佛教输入和模仿的第一阶段以后，在南北朝—唐代时期进入了快速发展、改造和逐步中国化的阶段，至宋元明清时期佛教已经完全本地化。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除了其在印度传统佛教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本地国情适应和调整的内在原因外，还在于自东晋以后争取到了历代统治者及其广大民众大力支持的外在因素，故此发展迅速，不仅可与中国本地产生的道教分庭抗礼，很多时期甚至还压过一头，以至佛寺佛塔在全国遍地开花，到处可见，并且规模等级不断提高，几可比拟于皇宫建筑，同时，僧尼人众不断扩大，势力得到空前的壮大，从而对中国各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造成了重大的历史影响，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要研究对象。

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作品等是佛教思想传播和阐释的重要实物媒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经过千百年的洗礼，中国大地上留下了大量的佛教寺庙、佛塔、石窟、佛教雕塑和壁画、佛教文献、佛教用品等遗迹遗物。因此，佛教考古学调查、发掘和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分支学科。

中国佛教考古是以佛教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分支，主要分石窟寺、平地 and 山地佛寺两大部分，其中包括与两者密切相关的造像、壁画、碑

刻、经幢、佛教用品等等，涉及到古代历史、古代建筑史、美术史、哲学宗教史、古代文献学、民族学、科技考古、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诸多研究科目。目前，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较为系统和独立，成果丰富，蔚为大观，而平地和山地佛寺遗址的考古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尚需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下面，我将从中国佛教考古学调查和发掘回顾、主要研究课题、以及问题和展望等三个方面进行简要论述，诚祈学界同仁指导和批评。

—

(一)、石窟寺考古調查和發掘

中国佛教石窟渊源于印度，始凿于公元三世纪，兴盛于五至八世纪，直到十六世纪时尚有凿建，其形制种类大致分有中心塔柱的塔庙窟、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僧房窟、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内设坛像的佛坛窟、小型禅窟等¹⁾。

对中国石窟寺的考古调查，始于二十世纪初及解放前国外学者的探险调查和发掘。自1893年至1931年，英国斯坦因、德国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法国伯希和、瑞典的喜龙仁、美国的华尔纳等纷纷来到中国西北地区，考察了新疆、内蒙、甘肃等地的一些佛寺和石窟，如尼雅、楼兰、米兰、丹丹乌里克、热瓦克、库车苏巴什、杜尔杜尔—乌库尔、图木休克、七个星、克孜尔、伯孜克里克、敦煌、黑河等地的佛塔和佛寺遗址，带走了大量的佛教雕塑、壁画、文书等佛教遗物。这些资料都在西方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有斯坦因《古代和阗》(1907年)、《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年)、《西域考古记》(1921年)、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险记》、勒柯克的《高昌图录》等，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中国佛教遗迹和遗物的研究热潮。

日本学者也不甘落后，1902—1914年间，大谷光瑞、橘瑞超，调查和发掘

了吐鲁番、楼兰、库车、和田等地的佛寺遗址等，收集了大量的珍贵文物。1918—1924年间，常盘大定、关野贞对中国各地佛教遗址进行了调查，随后于1925—1939年间陆续出版《支那文化史迹》、《支那佛教史迹》、《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等书。1938—1941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赴中国进行调查并发掘后，于1941年出版《响堂山石窟》，1951年发表出版《云冈石窟》16卷。

中国学者也相应地开展了一些调查。1918年，中国学者陈垣较系统地考察和考证了云冈石窟，后发表《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等调查云冈石窟，后发表《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北魏建筑》等文。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9年，中国石窟寺考古进入了草创时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阎文儒、宿白等教授率先开展了有关石窟寺考古地教学，培训了一批从事石窟寺考古的研究人才和领军人物。同时，敦煌莫高窟、云冈、龙门、克孜尔、响堂山、麦积山等各重要石窟寺所在地相继成立了研究院、研究所、保管所，开展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包括测量、著录)、发掘和研究工作。新发现甘肃永靖炳灵寺、武威天梯山、庆阳北以及陕西地区的石窟寺等。1957和1961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到响堂山和敦煌石窟开展了教学实习。1957年，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作《敦煌七讲》讲座，开创性地将考古学方法引入到石窟寺调查和研究中，标志着中国石窟寺考古的正式诞生。

1970年以后至今，中国石窟寺考古进入了发展和繁荣时期，各地运用考古学方法对石窟寺进行清理发掘、调查实测和综合研究，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²⁾。

1979—1981年，在宿白先生率领北京大学历史系石窟考古实习组，对新疆克孜尔石窟逐个调查、记录、实测，并对部分洞窟进行挖掘和清理，取得了重大突破。1997年整理出版了《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是目前出版的第一本石窟寺考古报告。

1980年以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又陆续在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河北邯郸南响堂石窟、河西走廊的早期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的部分洞窟进行了一些测绘和调查工作。

1988—1995年，继60年代对南区殿堂遗址的发掘，敦煌研究院对极为重要且又被长期忽视的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243个洞窟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发掘，对北区洞窟的性质和内涵有了新的认识，区分出僧房窟、禅窟(单室和多室)、僧房窟附设禅窟、座窟、礼佛窟和等形制，洞窟开凿以中段为早，以后陆续向两侧开凿。发掘揭示了北区洞窟是供僧众生前生活、居住、禅修之地和死后座理之所的性质，其时代从北朝一直延续到元代。2000年、2004年相继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2、3卷。

1989—1990年，新疆文物部门对克孜尔石窟谷西区部分洞窟的窟前遗址进行发掘清理，新发现洞窟30余个，且一些洞窟有打破关系，对克孜尔石窟的时代划分有重要的价值。

1994年，云冈石窟保管所对云冈石窟窟前遗址作了部分清理发掘，出土了一批贴金佛像残块和4处建筑遗址。

2002-200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部门联合组成考古队，在太原西南龙山北峰上，对创建于北齐、兴盛于唐代的童子寺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清理出院落、月台、大殿、佛台、经幢、僧房等遗迹，大殿面阔五间，中央佛坛已损毁，但发现了佛坛上矗立的五根石柱。确认八角面体石刻经幢身和幢顶为唐代遗物。近年来还调查发现了大佛像。

1999年，在新疆库车县70公里的克孜里亚大峡谷中新发现了一处孤存的阿艾石窟，内有壁画、汉文题记等³⁾。

2008年，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联合对龙门石窟擂鼓台窟前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唐代窟前踏道、窟前殿堂包石台基、宋代造像题记和建筑基础、唐宋时期窟前道路等遗迹现象。

解放以后，石窟寺考古的发展还体现在了《敦煌研究》、《敦煌学辑

刊》、《吐鲁番学研究》、《石窟寺研究》等学术刊物的创立，为广大学人提供了发表专业论文的平台。同时，许多图录、资料集、论文集、论著等也纷纷出版。首先当推，宿白先生199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中国石窟寺研究》，2010年《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一书出版。从1980年12月开始，日本平凡社、中国文物出版社合作，在北京和东京两地陆续出版《中国石窟》中日两种文版，共17卷，依次为：《敦煌莫高窟》5卷，《巩县石窟寺》1卷，《克孜尔石窟》3卷，《库木吐鲁窟》1卷，《永靖炳灵寺》1卷，《天水麦积山》1卷，《龙门石窟》2卷，《云冈石窟》2卷，《安西榆林窟》1卷。每卷发表图版192~300幅，论文2~5篇，并有图版说明、大事年表和实测图，还发表各石窟群的内容总录。另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壁画全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龙门石窟总录》、《须弥山石窟内容总录》、《敦煌石窟全集》、《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敦煌艺术品》等得以出版发行，推进了有关的学术研究。

另外，一些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时有召开，事后多出版了会议论文集：《1994年敦煌学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龙门石窟一千五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96年出版）、《炳灵寺石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云冈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保护卷、研究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出版）等。

此外，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所编的《天水麦积山石窟研究论文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编《永靖炳灵寺石窟研究文集》等论文集也得以出版。

上述诸多图录、学术论集的出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二)、平地和山地佛寺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如上所述，二十世纪初，西方和日本探险家首先在中国新疆等地佛寺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

较早对中国佛寺遗址进行调查的中国学者首推黄文弼，他曾于1927年、1930年、1943年三次考察了新疆塔里木盆地等地的佛寺遗址，后出版有《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吐鲁番考古记》(1954、1958)、《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西北史地论丛》等书。

1937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等人赴山西五台山调查，发现了唐代的佛光寺大殿。同时，梁思成和刘敦桢带领研究人员，调查了云南、四川等地40余个县的古佛寺等古代建筑，绘制了大量古建筑模型图，在营造学社的汇刊上发表了《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蓟县独乐寺山门考》、《云岗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等论文。1944年，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

新中国成立以后，平地和山地佛寺的考古工作虽然比较零散，但一直有持续不断的发现和发掘，有些还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下面主要按地区和时代顺序进行叙述。

1、中原地區

(1) 佛寺塔基地宮、塔內天宮的考古發現

自1964年以來，各省市均不斷發現有佛寺塔基地宮、塔內天宮，出土瘞埋舍利的器具及供養品等，大都具有明確的紀年。具體見下表(依地區順序)。

序号	發現地点	發現時間	出土主要遺迹、遺物	年代	備注
1	河北定縣城塔基	1964年	石函、琉璃鉢、銅鉢和琉璃葫蘆瓶、七寶飾物、珠寶	北魏 481年	《考古》66.5
2	河南洛陽北永寧寺塔基	1979	夯土塔基、堅穴方坑、泥塑像、珍珠、瑪瑙、水晶、象牙及銅錢等。	北魏熙平元年(526年)	《考古》81.3
3	陝西西安東郊清禪寺隋舍利墓	1966	墓志、灰陶罐、供養珠寶飾物	大隋開皇9年(589年)	《考古與文物》88.1
4	山東平陰隋舍利寶塔石函	1982	石函蓋頂蓋刻“大隋皇帝舍利寶塔”、青玉殘板、北周“永通萬國”、隋“五銖”錢	隋文帝仁壽年間(601~604年)	《考古》86.4
5	陝西耀州神德寺舍利塔基	1969	石函銘“大隋仁壽四年”(604年)、鎏金銅函、銅盒、鎏金銅函、琉璃瓶、銅瓶、金銀珠寶、波斯銀幣等	隋代	《考古》74.2
6	山西太原龍泉寺塔基地宮	2008	石函、鎏金銅飾木椁、木胎鎏金銅椁、木胎銀椁、金棺及“開元通寶”銅幣	武周時期	《2008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7	四川成都唐代塔基地宮	1960	石函、銅棺、銀罐、“五銖”錢	唐代	《考古與文物》83.3
8	江蘇句容行香朱陸村唐代塔基	1975	地宮、鐵函、銅椁、銀椁、小銅棺	唐代早期	《考古》82.2
9	甘肅涇川唐代大雲寺塔基地宮	1964	石函、鎏金銅函、銀椁、金棺、琉璃瓶、舍利、香料、織綉衬墊。	武周時期	《文物》66.3
10	陝西周至縣山游寺法王塔	1968	塔身、地宮，發現石碑、石函、鎏金銅棺、舍利舍利塔下銘)和唐代的《山游寺舍利塔銘》。	唐代	《山游寺隋唐塔銘兩種》王其禕 陝西人民出版社05年

序号	發現地点	發現時間	出土主要遺迹、遺物	年代	備注
11	河南登封法王寺塔基地宮		舍利盒、白釉細頸瓶、白釉双系罐、黑釉瓷壺等	晚唐	《2000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12	陝西臨潼唐代慶山寺塔基地宮	1985	地宮、“上方舍利塔記”碑、石雕舍利寶帳、銀罽金棺、兩琉璃瓶、金、銀、銅、鐵、瓷、三彩、琉璃、開元通寶幣等	唐開元29年	《文博》85.5
13	陝西扶風法門寺塔基地宮	1967	放第一枚佛指的八重寶函；置第二枚佛指的漢白玉灵帳三重函棺；盛第三枚佛指的五重函棺；藏第四枚佛指的漢白玉阿育王塔三重寶棺。供養品有金銀器、秘色瓷、琉璃器、石雕、絲織品等	唐咸通15年(874年)	《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14	山東惠民出土唐末五代定光佛舍利棺	1972	定光佛(燃灯佛)舍利棺、石椁、鐵棺、數枚開元通寶錢	唐末	《文物》87.3
15	甘肅灵台五代舍利地宮	1957	石棺、漆盒、琉璃瓶、墓志、銅鏡	五代	《文物》83.2
16	浙江杭州雷峰塔基地宮	2000-2001	純銀阿育王塔(藏佛螺髻發舍利)、釋迦牟尼坐像、鍍金銀器、小型金銅造像、石菩薩頭像、銅鐵鏡、鐵函、玉觀音、漆木器、玻璃瓶、絲織品、銅幣、石經、五代紀年銘文磚遺物	五代	《2001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17	江蘇蘇州虎丘北宋云岩寺塔	1957	塔第二、三層發現天宮。“建隆二年”(961年)銘石函，函內放經函，內藏《法華經》、珠飾、香爐、瓷碗等。第三層天宮石函內藏鐵鑄金涂地塔、木質喇嘛塔、舍利金瓶、玉幢、碗、杯、佛像、像龕、佛珠等	北宋	《蘇州虎丘塔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8年
18	河北定縣兩座宋代塔基	1969	靜志寺塔基地宮：銘文、題記，知建于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出土北魏興安二年(453年)石函，隋大業二年(606年)石函，唐龍紀元年(889年)石棺、金、銀珠飾等供養品。 淨衆院地宮：石函刻“大宋至道元年”(995年)銘、銀塔、銀棺、銀瓶、石塔、瓷瓶及銀、銅、瓷等供養具	北宋	《文物》72.8
19	河南密縣原法海寺旧址上，發現	1966	上下重疊兩方形石函：上層石函置三彩琉璃塔，下層“咸平二年”(998年)銘石函，有三彩琉璃	北宋	《文物》72.8

序号	發現地点	發現時間	出土主要遺迹、遺物	年代	備注
	了北宋塔基地宮		琉璃方塔、三彩琉璃舍利函、瓷舍利盒、銀舍利盒、琉璃器、銅佛像、銅錢		
20	江蘇蘇州宋瑞光寺舍利塔塔	1978	第三層天宮、双重木函、墨書“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銘、內置“真珠舍利宝幢”、琉璃葫蘆瓶、經咒、銀龍、銅錢、料石、佛像、佛塔、漆函、佛經、印章等	北宋	《文物》79.11; 86.9
21	江蘇連云港海清寺北宋阿育王塔		塔竣于北宋天聖九年(1032年)。塔內第二層天宮中石函內置鐵函、佛骨、琉璃瓶、銀椀、銀盒、葫蘆瓷瓶、銀棺、銀函、琉璃瓶、木蓮座及水晶、雄黃及錢幣等	北宋	《文物》81.7
22	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	1966	出寫經、刻經、《經志》(慶歷三年(1043年)入塔)、經袱、金涂塔、描金堆漆舍利函、銀塔、銀瓶、銅錢、佛像、琉璃瓶等	北宋	《文物》73.1
23	浙江金華北宋万佛塔塔基	1966	刻“嘉佑七年”(1062年)銘經幢。幢前放鐵函、佛像、塔、盒、鏡、錢幣	北宋	《金華万佛塔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58年
24	上海松江北宋興教寺塔地宮	1974	北宋熙寧、元佑年間(1068—1093年)所建。出土石函、唐宋銅錢、銅坐佛、漆函、銅臥佛和大小銀函、銀珠、沉香、佛牙、舍利子等	北宋	《考古》83.12
25	江蘇鎮江甘露寺宋代鐵塔地宮	1960	石函內有唐李德裕年太和三年(829年)銘石函、宋代銀函、銀盒、漆函、木軸、銀牌、銀太子像、琉璃珠、絲織品、銅錢等	唐宋	《考古》61.6
26	山東濟寧北宋鐵塔	1973	出北宋崇寧四年(1105年)鐵塔。第一層天宮中置舍利石函、瓷函和木函及銅佛、銅鏡、鐵牌、佛經、石碑	北宋	《文物》87.2
27	云南大理崇聖寺千尋塔	1979	塔頂中心出銅質方筒及東西兩側坑洞。方筒內經幢中有兩銀塔，東坑中舍利內函、鍍金銀塔。塔頂還出佛像、佛經、塔模、金剛杵、印章、佛珠、香料、銅錢等	大理國時期(1000~1160年)	《考古學報》81.2
28	浙江麗水碧湖鎮南宋塔基地宮	1960	出有佛經、銅佛、銅鏡、磚刻、碑刻、琉璃珠、錢幣、瓷殘器及佛牙等	南宋	《文物》63.3
29	北京順義縣遼淨光舍利塔基	1963	塔基地宮石經幢上刻“開泰二年”(1013年)銘。北部正中置銀圓盒5、琉璃瓶、石志、淨瓶、罐、盒、盤、飾物、佛塔、銅錢	遼	《文物》64.8

序号	發現地点	發現時間	出土主要遺迹、遺物	年代	備注
30	吉林農安万金鄉 遼代塔基	1970	遼開泰年間(1012~1021年)塔基地宮。地宮中置石塔、鐵塔、銅函、銀函，函內裝舍利。地宮內木桌上有碗、碟、箸、匙、絲織殘片、水晶飾物、腊筒、木刻佛像、木蓮花及銅錢等	遼	《文物》73.8
31	內蒙古宁城武官 營子遼塔地宮	1964	地宮頂石墨書“重熙十四年”(1045年)銘。地宮中石塔內依次套鐵函(朽)、銅函、鎏金銅函、銀函、琉璃 罐。鎏金銅函內放琉璃瓶、玉飾、珠飾、銅佛及銅錢。函前石桌上置瓶、玉飾、珠飾、銅佛及銅錢	遼	《考古》64.11
32	北京房山北戴村 遼塔基地宮	1977	地宮中石函刻“重熙二十年”(1051年)銘。函內放石佛像、瓷碟、銅碗、匙、鏡、銀碗、碟、筋、佛龕、幡架、宝花和水晶珠及舍利。在地宮石板蓋上立石幢	遼	《考古》80.2
33	遼宁朝陽遼代北 塔	1966	北塔地宮和天宮重建于重熙年間(1050~1055年)。地宮出石經幢，天宮中出有舍利金塔、瑪瑙、罐、佛骨。地宮和天宮中還出經塔、銀塔、銀菩提樹、琉璃瓶、瓷淨瓶、瓷盤、瑪瑙玉石龜及十二生肖	遼	《文物》92.7
34	天津薊縣獨樂寺 遼塔天宮	1963	塔上層天宮出銅質管狀器、水晶罐和木葫芦瓶，均藏舍利。天宮中“清宁四年”(1058年)銘舍利石函。天宮出碗、盤、碟、瓶、罐、盒、塔、金剛杵、鉢、如意、石玉飾物	遼	《考古學報》89.1
35	遼宁沈陽遼崇壽 寺白塔	1966	第一層天宮中置石函、鐵函、瓷罐、小木塔、“乾統八年”(1108年)銘銅函、銅函、銀函、鎏金函；塔基地宮石函、鐵函、銅函、銀函、葫芦瓷瓶、漢遼錢幣	遼	《文物參考資料》57.8; 《考古通訊》57.6
36	河北易縣遼淨覺 寺舍利地宮	1977	宮室西壁記“天慶五年”(1115年)年号，出舍利銀塔、金瓶及碗、盤、碟、七筋、瓶、盒、鉢、壺、熏爐、珠飾、漢宋錢幣等	遼	《文物》86.9
37	山西應縣遼佛宮 寺木塔	1974	塔第二、四層主像凹槽內均發現銀盒，內盛七宝与佛牙。第四層主佛凹槽內放大量經卷	遼末金初	《文物》82.6
38	浙江崇德崇福寺 西塔塔頂	1965	明代安放吳越金涂塔，塔內銀盒里藏舍利及金、銀、玉飾物、銅錢；明正德九年(1515年)入藏有莖花銀盒、七香、	明、清	《文物參考資料》56.1

序号	發現地点	發現時間	出土主要遺迹、遺物	年代	備注
			銅錢； 明天啓二年(1622年)佛龕內藏銅盒、金銀玉琥 珀質佛像、珊瑚樹、玉花、銅鏡； 清嘉慶十年(1806)入藏錫盒、經卷、王母像、 壽星像、佛像、花、羅漢珠、玉鳳、玉筆洗、 硃砂、銅錢等		
39	山東聊城鐵塔塔 基地宮中明代舍利 器具	1973	鐵塔北宋晚期建，其地宮內發現明代重慶的石 函、銀函及錢幣	明代	《考古》87.2
40	江蘇南京秦淮區 中華門外、雨花 路東側報恩寺塔 基地宮	2007- 2010	北宋大中祥符4年(1101年)所建、明代重建時沿 用的塔基地宮中，出土了鐵函、石函、銀椁 等。鐵函中七宝阿育王塔，內藏“佛頂真骨”	明代永樂至宣 德年間	《2008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2010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上表中，陝西法門寺、浙江杭州雷峰塔、江蘇南京大報恩寺塔基地宮出土的舍利器具，都是分別是唐代、五代、明代皇家供奉的舍利及其器具，等級高，工藝精，其考古發現引起的社會反響最強烈。除上述表列內容以外，其他還有一些塔基地宮被發掘，在此不一一列舉了。

(2)、佛像窖藏或佛像組群的發現

幾十年來，河北邯鄲、曲陽、河南洛陽、陝西西安等各地持續不斷地有佛像窖藏或佛像組群發現，數量眾多，此不一一列舉，此謹以出土石、銅、泥佛像較多的西安市為例進行說明⁴⁾。

序号	出土地点	出土時間	佛像種類數量	時代	備注
1	蓮湖區大土門村南	1957年	泥塑像、石像數百尊，部分造像刻有“大唐善業尼”	唐	金城坊開善尼寺遺址
2	西安東郊新成區電廠路龍華村北側	1959年	石像窖藏佛像10	唐	長樂坊大安國寺

序号	出土地点	出土時間	佛像種類數量	時代	備注
3	未央區漢城街道辦事處范家堡	1971	佛和菩薩像3	北周	
4	未央區六村堡街道辦事處東席村	1973	菩薩像1、四面造像碑1	北周	
5	雁塔區小寨街道東八里村	1974年	鍍金銅佛座 刻“開皇四年”銘 上有佛1菩薩2獅2	隋	昌樂坊
6	未央區草灘街道辦事處李家街村	1975	佛龕像17	北周	
7	未央區六村堡街道辦事處中官亭村	1982	立佛像2、觀音立像(保定5年題記)1	北周	
8	泮鑄西路以南、勞動南路以西	1962、1966	石造像窖藏 附近出百件善業泥像	唐	禮泉寺
9	未央區未央宮辦事處大劉寨村西	1984	佛頭像2	北周	
10	蓮湖區空軍通訊學院		立佛像2	北周	
11	蓮湖區西稍門西北空軍通訊學院	1984等	出北朝、隋唐石像窖藏 出佛、菩薩石像32		金城坊樂善尼寺(溫國寺)
12	西安大南門外冉家村南	1965	窖藏坑石佛造像11	隋	崇義坊正覺寺
13	蓮湖區桃園街道辦事處原西安民航機場	1966	觀音像1、釋迦千佛造像碑1、佛頭2	北周	
14	未央區漢城街道辦事處西查村	1992	觀音像3	北周	
15	灊橋區紅旗街道辦事處灣子村	2004	立佛像5、佛座4	北周	
16	西安未央區中查村西北北周長安城宮城之南	2004	造像31件, 包括立像、坐像、立菩薩像等	北周	《古都這珍—長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 文物出版社2010年
17	未央區六村堡街道辦事處饗寨村	2007	佛像4、佛頭像2、菩薩像3、菩薩頭像1、殘佛座2	北周	

(3)、佛寺遺址

除了上面佛塔地宮及佛像組群的考古發現之外，佛寺遺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正越來越受到重視，近年來新發現逐步增多起來。

1963、1979~198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调查和发掘了河南省洛阳市东汉魏洛阳故城的永宁寺遗址。经勘察，寺院平面呈长方形，南北305米东西260米。塔基于围墙内正中部位，平面呈方形，台基四边用青石空砌压边，基座四面均设踏道。塔以北有一片较大的夯土台基遗迹，应为正殿基址。考古揭示其为布局的中国早期佛寺建筑前塔后殿的典型布局实例。寺址出土大量石雕瓦瓦当、佛教泥塑残像。佛教泥塑残像有大小两种，大像较少，有佛和菩萨造像。小像出土约300余件，多为贴壁“影塑”，包括飞天菩萨比丘以及世俗供养人像，有高冠大履褒衣博带的上层人物及其侍从文吏和武士等造型精致，形态生动⁵⁾。

1981年，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对大同市东北方山南麓的北魏思远佛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了北魏、辽金和明清等时代的文化层，清理了北魏时期的山门、实心体回廊式塔基、佛殿、僧房等建筑遗迹，出土北魏莲花化生瓦当、佛教造像残件等⁶⁾。

2010年，山西云冈石窟研究院发现了一组较完整的北魏寺庙遗址，具体有北廊房、东廊房、西廊房、南廊房、塔基和砖瓦窑遗址。2011年，又在距此寺院400米的窟顶发现了一处体量更大的北魏石结构塔基遗址。佛塔建筑的结构，它由三部分构成，即地基(基础)、基座、石塔底层建筑基座平面接近正方形，坐北朝南，基座四面周围石砌墙体，基座南面设东西向东斜坡踏道和西斜坡踏道各一条，可以从东、西侧两个不同方向登临上塔的基座。底层建筑由塔芯实体、环绕塔芯的回廊两部分建筑组成。塔身正中有贯穿上下的石塔轴心柱刹柱。这些考古发掘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对云冈石窟“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的描写提供了实证。

1996年10月，山东青州发现龙兴寺佛像窖藏，窖藏东西长8.6米，南北宽6.7米，深度不到3米，出土佛像400余尊，年代大多是南北朝时期⁷⁾。

2002年，河北临漳县赵彭城邨城遗址发掘出北朝佛寺塔基遗迹，其后在佛塔周边持续进行了考古工作。2011~2012年度发掘了中轴线北端大型建筑基

址、东南院大型建筑基址，取得了对该寺院遗址布局认识的重要突破，证明赵彭城北朝佛寺是以佛塔为中心、重要轴线上建造大型殿堂式建筑、多院落式布局的大型佛寺。2012年1月，又在邳南城东郭城区、北吴庄村北抢救性发掘了一处大型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造像数量达到2895件(块)，多数造像保存有较好的彩绘和贴金痕迹，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和唐代，可谓建国以来迄今所知出土数量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藏坑⁸⁾。

1997年至2000年，洛阳市文物管理局、龙门石窟研究所与意大利中远东研究所、那波利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合作，对洛阳龙门石窟以西的唐奉先寺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殿址、水道等遗迹以及瓷器、石刻造像等遗物⁹⁾。

2005年至2006年间，对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县的唐宋时期的龙兴寺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房址、方形砖塔基址、北宋罗汉殿址、水井、佛像坑、墓葬等遗迹，出土石刻造像、经幢、“大中九年”(855年)天王石像、石刻经版、琉璃构件、陶瓷器、铜镜、钱币等大量遗物¹⁰⁾。

1973年和198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西安市铁炉庙村的唐密教祖庭青龙寺遗址，发掘出东西并列的两组院落以及寺院北大门遗迹。其中，西院为带有回廊的塔院，有中三门、木塔，塔北佛殿及四面回廊等基址，东院清理出早晚两期叠压的殿堂基址，柱网坑排列整齐¹¹⁾。

1985、199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碑林区白庙村发掘了唐长安城名寺的西明寺遗址，两次发掘近万平方米。揭露出寺院东部的第一组三个院落组成的偏院遗址，清理出前院前殿、中殿、北殿、四面回廊院墙、庭院、水道渗井、道路、南部中央夹道等遗迹，出土石灯、鎏金铜佛像、石佛像、陶佛像、碑刻残块、石茶碾、瓷碗、瓷柱子、陶砚、玻璃鱼饰及“乾元重宝”、“开元通宝”钱币等遗物¹²⁾。

2011年开始，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二队组成了辽上京城联合考古队，对内蒙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的辽代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揭露出佛寺的长方形院落、四

周院墙、中轴线上大型六角形砖木混合结构佛殿、左右两侧对称布置的小型六角形砖塔、大殿前小型建筑基址和广场等遗迹，出土贴金泥塑人面像、石像、石经幢、铜镜、铁器、陶瓷器等大量遗物，为研究辽代考古、历史、佛教和建筑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¹³⁾。

2、邊疆地區

1957年，考古学家黄文弼第四次进入新疆，调查了古城、寺庙等遗址，后经考古所整理，1983出版有《新疆考古发掘报告》。

1963、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对黑龙江宁安市渤海镇境内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确定1-9号佛寺9处。其中，东城西起第一列、北数第二坊西部的1号佛寺规模较大，由主殿、穿廊和东西二室三部分组成，呈凸字形殿阁并存形，三者台基连为一体。主殿，东西23.68米、南北20米。而城北外的9号佛寺为长方形独立佛殿，面阔5间，进深4间，外有回廊，殿内中心坛座减柱¹⁴⁾。

1959年和1986年，宿白先生两次入西藏拉萨、山南、日喀则、江孜等地区，进行调查，不辞辛劳，亲自记录、绘图，并运用考古类型学原理，对西藏佛寺的平面布局以及科学分期进行了研究，先后撰成了《西藏拉萨地区佛寺调查记》、《西藏山南地区佛寺调查记》、《西藏日喀则地区寺庙调查记》等系列研究论文，1996年结集为《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奠定了西藏佛教考古研究的基础。

1985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了对西藏阿里地区的文物普查，主要对象集中在以古格王国时期都城札不让为中心的古格时期建筑遗址，其调查成果体现于1991年出版的《古格故城》(上、下册)中。

2005年至200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对西藏萨迦寺的北寺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和局部发掘，发掘清理了萨迦南寺羊

马城城墙及护城河遗迹、北寺的得确颇章遗址、乌孜大殿遗址以及塔林的部分塔基进行了，同时还对萨迦北寺的其他建筑遗迹如桑阿德吉林、东热布拉克等进行了实地考古调查和局部清理¹⁵⁾。

新疆楼兰、尼雅、交河故城等丝绸之路沿线的大遗址中都发现有佛教建筑遗址遗迹，都是“木骨泥墙法”构筑，包括佛塔、寺院、佛堂和佛坛四种形式。

1995年，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有关机构合作组成的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对新疆民丰县沙漠腹地魏晋时期尼雅佛教寺院遗址。寺院南有佛殿(FS)，西是僧房和讲经堂(FD)，北有带前廊的房址，中央为一面积约500平方米的广场，可见是由佛殿、僧房和讲经堂等五组单元建筑构成的一座完整佛教寺院，出土木雕天人像、佛和菩萨像的一些壁画残片¹⁶⁾。

1993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法国科研中心135所合作在和田县城北约220多公里的沙漠中发现并发掘了喀拉墩附近魏晋时期的两座佛殿遗址(N61、N62)。墙壁都用“木骨泥墙法”构筑，整体平面均呈“回”字形，内为正方形佛座台基，四周是行道，内外两层墙壁间相距约为2米。出土立佛和坐佛的一些壁画残片¹⁷⁾。

2002年10月，新疆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迹学术研究机构共同组队，在策勒县城北约90公里的沙漠中，发现并发掘了一座佛寺遗址(CD4)，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8.2米、东西宽6.02米，墙壁也用“木骨泥墙法”构筑，出土有佛像、骑士等形象的壁画残片和墨迹，婆罗谜文题迹等。该寺形制与克里雅河喀拉墩附近的佛寺相同，其始筑年代早到公元5世纪，使用至8世纪吐蕃占领于阆前¹⁸⁾。

2002年至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新疆策勒县达玛沟乡东南约7公里的沙丘中发掘了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其中，1号遗址为小型佛堂遗址，坐北朝南，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米、东西宽1.7米。屋内紧贴北墙的覆莲台上为主尊泥塑佛像，残高1.45米，其四面残壁保留大量立佛、坐佛、菩萨等壁画。2号遗址坐西朝东，为一“回”字形的佛堂，内置土坯空砌

的方形泥塑佛像台基。佛堂东部和北部各加一个长方形的侧堂，出土佛头和千佛壁画残块、毗卢遮那佛木板画、柱刹、擦擦、五铢和开元通宝铜钱等。其始建年代有可能是开元年间(713-741年)。2006年，还对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教遗址进行了小范围的发掘，出土佛头、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头像、小坐佛等壁画残块。3.举团扇背光部分壁画残块。4.壁画残块。5.壁画残块6.卷草纹壁画残块等，其始建时代为公元7世纪¹⁹⁾。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古城之西的高昌回鹘佛寺遗址，清理了寺院的南面和东面，揭示出寺院平面布局和结构佛寺平面呈长方形，地面为夯土台基，地面以上全部用土坯砌筑。整个遗址可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南面是残庭院、配殿、僧房、库房等建筑群，北部是残高约14.3米的正殿，其四周环筑洞窟。殿外南面上部有一层洞龕，东、北和西三面外墙都设两层佛洞龕。殿内设佛坛供佛、菩萨、天王和罗汉像，还有一尊涅槃佛大像。塑像当年多贴金妆彩。回鹘文题记中“神圣的亦都护”和“长史”“公主”之名，证明7寺院的规格之高及与王室的关系。佛寺遗址的使用年代约在公元10世纪中期至13世纪中期²⁰⁾。

二、

中国佛教源远流长，遗址遗物异常丰富，无论是建筑单元，还是造像、壁画、文书佛经等等，都是研究的对象，凡此都决定了中国佛教考古学研究内容之广、研究难度之巨。几十年来，中国佛教考古学领域发表的有关论文汗牛充栋，涉及到诸领域的各个方面，故此，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一篇文章中尽掠其美，而只能作一管窥之举。

(一)、石窟寺考古方法的改進

在石窟寺的考古调查研究方法中，过去常规的方法时是用类型学的方法，进行对比、分类、组合的研究。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以宿白先生为首，开始对以前的方法进行反思和革新提高。一是将考古地层学的方法应用在石窟寺的调查研究中，即借用了考古地层学中早晚文化层的叠压打破关系，来分析归纳石窟中早晚佛龕、雕像、纹饰、甚至彩绘等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从而得出其年代早晚的可靠结论，但其叠压打破关系与早晚文化层关系是相反的：即晚期洞窟中决不会有早期雕凿的造像，但可能会有早期遗风；在早期洞窟中，则可能会有晚期补刻的造像。这一原理在云冈等石窟研究中都得到了运用²¹⁾。二是认识到考古发掘对于石窟寺研究至关重要。如通过对地层的发掘，发现了云冈石窟历史上北魏、唐、辽金时期的窟檐建筑遗迹，在龙门擂鼓台窟前区域，发现了唐代窟前踏道、窟前殿堂包石台基、宋代造像题记及唐宋时期窟前道路等。这些成果对于深入了解石窟寺的建筑沿革、分期断代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關於塔基地宮和舍利瘞埋方式的研究

历年来，中国发掘清理的佛寺塔基数量众多，主要有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塔基、河南洛阳北魏故城永宁寺塔址、河北临漳县东魏北齐佛寺塔址、河北定县隋静志寺塔基、陕西耀县隋神德寺舍利塔基、陕西周至仙游寺法王塔、陕西西安隋唐青龙寺塔址、陕西扶风唐法门寺塔址、陕西临潼唐庆山寺塔基、甘肃云泾大云寺塔基、山西太原市太原唐龙泉寺塔基等，从而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和研究。其中，徐萃芳先生的研究最为权威。他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有关章节条目及《中

《国舍利塔基考述》一文中，曾广泛收集1982年以前有关中国舍利塔基的考古资料，并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总结出中国舍利塔基及其舍利瘞埋器具的发展演变规律，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即佛塔从中心塔刹为中心的木塔向以楼阁式或密檐式砖塔为主的塔形转变过程中，也发生了从使用砖石函和玻璃瓶到使用地宫和金棺银椁进行舍利瘞埋的方式的变化过程²²⁾。当然，其他学者也作过相关的研究，丰富和补充了徐萃芳先生的观点²³⁾。特别是最近二十几年的佛塔塔基的新发现，也引证了其结论之实。

(三)、佛寺形制布局的研究

中国发掘的佛寺遗址数量屈指可数，主要有：山西大同北魏方山思远浮图遗址、河南洛阳北魏故城永宁寺遗址、河北临漳县邺城东魏北齐佛寺遗址、陕西西安隋唐青龙寺遗址、陕西西安唐西明寺遗址、河南洛阳唐奉先寺遗址等。这些遗址除平城思远浮图遗址外，都是局部发掘，且主要在各都城遗址内或附近。

1997年，宿白先生根据考古资料，先后发表了《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隋代佛寺布局》两篇论文，对隋代及以前的佛寺布局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认为：公元5世纪北魏迁洛之前，佛寺以塔为中心，但开始出现讲堂、禅房。公元5世纪至南北朝结束，一般佛寺仍以塔为中心，塔居殿前。而皇家寺院则开始出现别院山池等。隋代佛寺仍沿前期以佛塔为主要建置的传统布局²⁴⁾。

唐代佛寺非常发达，佛寺布局，研究者根据遗址发掘资料，结合敦煌壁画、文献记载等材料，提出了唐朝时佛寺布局已转变成佛殿为主、塔居次要地位、多院落的形式。唐朝时佛寺形制布局已转变为塔佛殿为主、塔居次要地位、多院落的形式²⁵⁾。

至于唐代以后的佛寺，因禅宗的兴盛，禅寺已占绝大多数，其布局有了新的变化，伽蓝七堂格局成为主流²⁶⁾。

(四)、有關長江流域器物上佛教圖像及佛教南傳之路的考察与研究

1991年起，由中国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和日本龙谷大学联合组成的“佛教初传南方之路”课题调研组先后五次沿长江流域对四川、湖南、湖北、江苏、广东等十个省、市、地区“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展开了实地考察和调查。两年后，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由上述单位共同编著，中国文物出版社和日本龙谷大学联合出版了文物图录《佛教初传南方之路》，该图录集中了半个世纪以来发现的有佛像造型的有关的考古遗存，这批文物的佛像造型大多雕饰或刻画于其它的承载体上，(佛像造型艺术品：崖墓浮雕中的石刻佛像、摇钱树插座、铜钱树、东汉末至魏晋的画像石墓、鎏金铜饰件、铜镜、陶瓷谷仓罐即魂瓶、青瓷器具，长江上游四川地区所见钱树及崖墓石刻上的佛像形象，在长江中游出土的文物中仅见于铜质器物如铜镜，而堆塑于魂瓶上的佛形象也只有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可以觅见它的身影。表现在佛像承载体上的这种差异是地区性的，)因而与后来完全佛教意义上的独立的佛教造像不同，只能说是一些有佛教含义的形象而已，称其为佛的形像或更妥当。这类造型仅见于南方，绝大部分发现于长江流域，时期则以2-4世纪为限，同一时期北方同类艺术品很少被发现，于是，这类佛像艺术品与佛教初传中国的关系，南方和北方，海路与陆路在早期佛教传入中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相因而至。佛教初传时期，南方和西域通过不同的途径，依靠各自的传播方式，形成最初的佛传根据地，并继而将佛的信息传递到中原，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是多元的，陆路和海路在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其地位和作用是同等的，似不必分出孰先孰后²⁷⁾。

(五)、關於石窟、佛造像樣式與風格的研究

關於石窟樣式和風格的繼承和流變，宿白先生曾發表過《涼州石窟遺迹與“涼州模式”》、《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兩文。在前文中，宿白先生根據自己1994年對天梯山石窟的實地考察資料，確定中國石窟起源於天梯山石窟的第一、第四窟，即早期北涼洞窟，或涼州石窟遺迹。北涼沮渠蒙遜開鑿的天梯山石窟就是“涼州石窟”，創立了“涼州模式”(十六國時期，涼州為佛教文化中心)。雲岡石窟21個主要洞窟，包括曇曜五窟，具有涼州及龜茲佛教之遺風。而仿照雲岡石窟開鑿的龍門石窟，也沒有脫出涼州石窟的模式。在後文中，宿白先生指出雲岡石窟實現了印度、中亞等多種佛教藝術造像風格的融會貫通，開始了“中國化”，其中期石窟中出現的中國宮殿建築式樣雕刻、中國式佛像龕、中國式建築裝飾等，形成了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轉折點的“雲岡模式”。敦煌莫高窟、龍門石窟中的北魏時期造像均受到雲岡石窟的影響²⁸⁾。

至於佛像風格，宿白先生在1999年撰寫了《青州城考略——青州城與龍興寺之一》、《龍興寺沿革——青州城與龍興寺之二》和《青州龍興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幾個問題——青州城與龍興寺之三》)。三篇文章，敏銳地指出龍興寺造像風格在東魏末期與北齊之際發生了突變，“一種有別於褒衣博帶式服飾的佛教造像逐漸興起”，即薄衣透體的佛像体现出青州風格的另一個方面。此種風格佛像，肉髻微凸，雙目低垂，體態修長、健美，肩寬而平，胸部微微隆起，小腹略突，細腰，服飾輕薄，緊貼身體，很好地再現了“曹衣出水”的效果。菩薩像也是如此。這種“青州風格”主要流行於北齊時期²⁹⁾。

金維諾先生認為“曹家樣”源於中亞粟特，衣薄而透明，如“出水”一樣的風格。河北曲陽修德寺、山東青州龍興寺出土的北朝早期造像，屬於比較典型的秀骨清像式，或稱“青州樣式”或“薄衣式佛像”，表面平滑、線刻簡單，目光沉靜祥和，富於內在精神³⁰⁾。

上述佛像樣式和風格的確立，為此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準繩。

(六)、陵墓佛寺遺址的探討

陵寺的讨论是一个新的课题。最早注意并论述陵寺者为白文固，他在《宋代的功德寺和坟寺》一文指出：“陵寺，就是皇帝的陵旁寺。”北宋时期，帝陵附近，都修有陵寺，已经形成制度。而溯其源头，可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³¹⁾。

其后，冉万里对中国古代的陵寺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唐代的陵寺做了相应的考证，提出了“中国古代帝陵建寺制度，滥觞于南北朝，发展于隋唐，成熟于北宋”的观点。北魏永固陵前的思远佛寺即为早期的陵寺。所谓陵寺，特指修建于皇帝陵园附近的寺院，是帝陵附属建筑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其修建者多为后代皇帝或皇室成员，出于一定的目的或传统习惯而为前代皇帝修建陵寺，也有皇帝本人为其皇后修建陵寺的。因陵寺本身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所以陵寺的规格都比较高，可以归属于皇家寺院之列³²⁾。张建林先生在探讨唐代丧葬习俗中的佛教因素时亦有所涉及唐代陵寺³³⁾。

田有前调查了唐代昭陵附近的瑶台寺、高宗时期为河北祖陵修建的光业寺、中宗定陵附近的定陵寺三处代陵寺遗址，探讨了其建立的时间、位置和功能等。指出陵寺考古对于中国帝陵考古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后主要任务在于搞清历代陵寺制度的演变、陵寺区的基本布局和遗迹、石刻分布和保存现状等问题³⁴⁾。

(七)、佛教石經的考古研究

自北齐开始至明代，中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四川、重庆等地的佛教信徒们，在山崖壁和石碑上刊刻了规模宏大数量惊人的佛经，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1957年，对房山云居寺埋藏的石经进行了考古发掘，揭开了石经研究的序

河³⁵⁾。1978年，宿白先生为第一届石窟寺考古研究生开设了“佛籍版本目录”的课程，其中包括房山云居寺石经等内容，并带领学生进行了实地考察，成为该领域的领路人。

其后，以德国海德堡大学雷德侯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联合中国学者，对中国各地石经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综合运用考古学和美术史的方法进行研究，时间长达25年之久。期间，召开了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使石经的研究成为中国佛教考古学的一项重要内容³⁶⁾。

結 語

综上所述，几十年来，中国佛教考古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还不少：石窟寺的分区、分期尚待全面开展、深入；跨区域和区域内石窟寺之间的关系以及石窟寺的综合研究较薄弱；佛寺遗址多仅发掘出布局，被完整发掘的佛寺遗址几乎没有；佛寺遗址的考古报告很少，远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也与中国千百年来的佛寺数量远不相称；中外佛寺的比较研究比较零散，不够全面；佛教宗派与佛寺形式的关系尚不明晰；佛寺与都市、乡镇的关系，等等，都值得去探究。

展望未来，我们对中国佛教考古的发展充满信心，其一是通过前辈们的努力，中国佛教考古学的框架体系已经大致构搭起来，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其二，通过几十年来的工作，已经积累起比较丰富的第一手考古资料，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三，已经建立起老中青结合的专业人才队伍，搭建了必要的学术平台，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展露才能，在研究领域占领了一席之地，成为科研的生力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关器材设备的配备和科研经费的拨付已经不再是束缚科研的瓶颈，而是越来越成为发展的促进剂量和催化剂；近十

年来，佛教遗址考古越来越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调查和发掘的遗址开始增多，大大地推动了佛教考古学的发展，相关研究越来越精细化、系统化、科技化。由此可见，中国佛教考古学的发展前景无比美好。

注释：

- 1) 国家文物局编：《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
- 2) 李裕群《古代石窟寺》，文物出版社，2003年。
- 3) 盛春寿等：《阿艾石窟》，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
- 4) 《表一，西安出土北周石刻佛教造像统计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古都遗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文物出版社2010年；《表二，隋唐长安城佛寺遗存一览》，龚国强：《隋唐长安佛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 6) 大同市博物馆胡平：《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2007年4期。
- 7) 夏名采《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窃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魏北齐佛寺塔基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3年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0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12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及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中国文物信息网2013年03月28日。
- 9) 刘景龙、李永强：《洛阳龙门奉先寺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1年2期。
- 1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邛崃市文物管理局：《四川邛崃龙兴寺-2005-2006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青龙寺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2期。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期。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考古》2013年第1期。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六顶山与渤海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 15) 《西藏萨迦寺考古发掘再获重要成果》，《2007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8年。
- 16) 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卷2，中村印

- 刷株式会社, 1999年; 张铁男、王宗磊: 《95年尼雅遗址93A35佛教寺院发掘简报》、《1996年尼雅93A35号遗址中FA、FB、FC、FD发掘简报》, 分别载于《新疆文物》1998年第1期、1999年第2期。
- 17) 中法联合克里雅河考古队: 《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考察概述》, 《考古》1999年第7期。
 - 18) 中国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 《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 文物出版社2009年; 刘国瑞、屈涛、张玉忠: 《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新发现的佛寺壁画》, 《西域研究》2005年4期; 盛春寿、李军、张铁男等: 《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新发现的佛寺壁画》, 《边疆考古研究》第七辑, 2008年。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 《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2007年第4期。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 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 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1年。
 - 21) 杭侃: 《云冈第二十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 《文物》1994年10期。
 - 22) 徐萃芳: 《中国舍利塔基考述》, 《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 台北允晨文化1995年。
 - 23) 杨泓: 《法门寺塔基发掘与中国古代舍利瘞埋制度》, 《文物》1988年10期。
 - 24) 宿白: 《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 《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年; 宿白: 《隋代佛寺布局》, 《考古与文物》1997年2期。
 - 25) 萧默: 《敦煌建筑研究》, 文物出版社, 1989年; 梁思成: 《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 《梁思成文集》(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 龚国强: 《隋唐长安佛寺研究》, 文物出版社2006年; 周绍良主编: 《梵宫——中国佛教建筑艺术》,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 26) 戴伦: 《禅宗寺院建筑布局初探》, 台北明文书局1990年。
 - 27) 梁白泉等: 《佛教初传南方之路》, 文物出版社, 1993年; 阮荣春: 《佛教南传之路》,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0年。
 - 28) 宿白: 《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 《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宿白: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 文物出版社, 1991年。
 - 29) 宿白: 《青州城考略——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一》, 《文物》1999年第8期; 《龙兴寺沿革——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二》, 《文物》1999年第9期; 《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三》, 《文物》1999年第10期。
 - 30) 金维诺: 《中国古代佛雕: 佛造像样式与风格》, 文物出版社2002年。
 - 31) 白文固: 《宋代的功德寺和坟寺》, 《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5期。
 - 32) 冉万里: 《帝陵建寺之制考略》, 《西部考古》第一辑, 三秦出版社, 2006年。
 - 33) 张建林: 《唐代丧葬习俗中佛教因素的考古学考察》, 《西部考古》第一辑, 三秦出

版社, 2006年。

34) 田有前: 《唐代陵寺考》, 《文博》2010年第4期。

35) 中国佛教协会编: 《房山云居寺石经》, 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36) 罗绍: 《中国佛教考古学的开创者—宿白先生九秩华诞献词》, 《石窟寺研究》第三辑, 文物出版社2012年。

Abstract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regarding Buddhist archaeology in China

Gong guoqiang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after input and imit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to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of the first stage, it entered a rapid development, reform and gradually phase of Chinese localiz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nd Tang Dynasty, until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uddhism has been completely localized.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China, in addition to its intrinsic reason that 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Indian Buddhist thought, then adapt and adjust to local conditions of China,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external factors that after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it got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rul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herefore, its rapid development can not only rival with Taoism, many times, it even pressure over the Taoism. It led that Buddhist stupa in the country as well as everywhere, and the level of the scale was constantly improved, a few can be compared with the palace buildings.

Meanwhile all the monks and nuns who constantly expanding forces have received unprecedented growth.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Buddhism, as the spread and interpretation medium of the Buddhist thought, Buddhist architecture and works of art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important role. So Buddhist archaeological surveys, excavations and research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and branch of Chinese archaeology.

Chinese Buddhist archaeology is an archaeology branch that study with the Buddhist relics.

it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cave temples, plains and mountain temple.

Currently, Chinese Cave Temple archaeology research is comparatively systematic and independent. It also got a lot of rich results. But the flat and mountain temple ruins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s relatively weak, it still needs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Although Chinese Buddhist archaeology have got great achievement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Cave Temple partitions, staging still needs to be fully carried out. Relationships across regions and between regions within the cave temples and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cave temples are still relatively weak.

There are many Buddhist relics that only be excavated of the layout. There are almost no Buddhist temple ruins that were completely excavated. The reports of the Buddhist archaeological sites is so rarely that it can not fulfill with the needs of researchers.

Comparative Study of fragmented temple i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Buddhist sects and Buddhist temples in the form of relationship is not clea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re

Cities, towns, etc. are worth to explore.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scholars are concerned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Buddhist archaeology, Surveys and excavations of the ruins began to increase, it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relate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Related researches become more sophisticated, systematic, and technological.

It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t archeology is incomparably great.

중국불교고고학의 조사, 발굴과 연구

번역 정대영 || 동양대학교 문화재발굴보존학과

초록

불교는 동한시기 중국으로 전래된 이래, 漢代와 三國, 兩晉시기의 불교수입과 모방의 첫 단계를 거쳐, 북조시기에서 唐代에 이르러 발전, 개조, 중국화의 단계에 들어간다. 이후, 송·원·명·청시기에 이르러 불교는 완전히 토착화되었다. 중국에서의 불교 발전은 인도 전통불교 사상의 기초와 더불어 중국적 상황에 대한 적응과 조절이라는 내재적인 요인 이외에도 東晉이후 역대 통치자와 민중의 폭 넓은 지지라는 외부적인 요인으로 급격히 발전하였다. 불교는 중국 고유의 도교와 그 우월성을 두고 다투기도 하였으며, 대부분의 시기에는 보다 더 우월한 지위에 있었다. 그러므로 사찰과 불탑은 전국에서 발전하였으며 규모와 등급도 왕궁건축과 비견될 만 하였다. 아울러 승려의 수도 증가하여 그 세력이 전례 없이 규모에 이르렀다. 이에 중국 각 시기의 정치, 경제, 문화, 예술 등 여러 방면에게 중요한 역사적 영향을 남김으로써 국내외 학계의 중요한 연구대상이 되었다.

불교의 발전 과정에서 불교건축과 불교예술품은 불교사상의 전파와 해석에 중요한 실물 매개로 매우 중요한 가치를 지니고 있다. 중국에는 오랜 세월을 거친 수많은 불교 사찰과 불탑, 석굴, 불교조각과 벽화, 불교문헌, 불교용품 등의 유적과 유물이 남아 있다. 그러므로 불교고고학의 조사, 발굴, 연구는 중국 고고학의 중요한 구성요소로 독립된 분과학문으로 자리매김하고 있다.

최근 중국불교고고학은 다양한 연구성과를 도출하였지만 많은 문제점도 남겨두고 있다. 석굴사의 分區, 分期는 더욱 전면적으로 진행되어야 할 과제이다. 단일 지역 안 밖의 석굴사 사이의 관계와 석굴사에 대한 종합적인 연구가 비교적 미약하다. 불사유적은 대부분 배치형태만이 발굴조사되었으며 전면적인 발굴조사가 진행된 불사유적은 거의 없다. 불사유적에 대한 고고학 보고서도 많이 부족하여 연구자의 수

요를 만족 시키지 못하고 있다. 유구한 중국역사에 비해 불사유적이 많지 않은 점도 지적할 수 있다. 국내외 불사에 대한 비교연구도 매우 산발적으로 진행되고 있다. 불교종파와 불사의 형식에 관한 연구도 아직 규명되지 않고 있다. 불사와 도시, 鄕 鎮과의 관계에 대한 연구도 과제로 남겨져 있다.

중국불교고고학은 불교유적과 유물을 연구대상으로 하는 고고학의 분과학문이며, 대체로 석굴사와 평지, 산지사찰로 양분할 수 있다. 그 가운데에서 불교조상을 비롯하여 벽화, 비각, 석등(經幢), 불교용품 등은 고대사, 건축사, 미술사, 철학종교사, 문헌학, 민족학, 과기고고, 문화교류사 등의 다양한 연구분야와 밀접한 관련을 가진다. 현재, 중국석굴사고고학의 연구는 비교적 체계적이고 독립적 영역을 확보하고 있으며 다양한 성과들을 제시하고 있다. 평지와 산지사찰유적에 대한 고고학적 연구가 상대적으로 미약하며 앞으로 발전과 제고(提高)가 필요하다.

불교는 동한시기 중국으로 전래된 이래, 漢代와 三國, 兩晉시기의 불교수입과 모방의 첫 단계를 거쳐, 북조시기에서 唐代에 이르러 발전, 개조, 중국화의 단계에 들어간다. 이후, 송·원·명·청시기에 이르러 불교는 완전히 토착화되었다. 중국에서의 불교 발전은 인도 전통불교 사상의 기초와 더불어 중국적 상황에 대한 적응과 조절이라는 내재적인 요인이외에도 東晉이후 역대 통치자와 민중의 폭 넓은 지지라는 외부적인 요인으로 급격히 발전하였다. 불교는 중국 고유의 도교와 그 우월성을 두고 다투기도 하였으며, 대부분의 시기에는 보다 더 우월한 지위에 있었다. 그러므로 사찰과 불탑은 전국에서 발전하였으며 규모와 등급도 왕궁건축과 비견될 만 하였다. 아울러 승려의 수도 증가하여 그 세력이 전례 없이 규모에 이르렀다. 이에 중국 각 시기의 정치, 경제, 문화, 예술 등 여러 방면에게 중요한 역사적 영향을 남김으로써 국내외 학계의 중요한 연구대상이 되었다.

불교의 발전 과정에서 불교건축과 불교예술품은 불교사상의 전파와 해석

에 중요한 실물 매개로 매우 중요한 가치를 지니고 있다. 중국에는 오랜 세월을 거친 수많은 불교 사찰과 불탑, 석굴, 불교조각과 벽화, 불교문헌, 불교용품 등의 유적과 유물이 남아 있다. 그러므로 불교고고학의 조사, 발굴, 연구는 중국 고고학의 중요한 구성요소로 독립된 분과학문으로 자리매김하고 있다.

중국불교고고학은 불교유적과 유물을 연구대상으로 하는 고고학의 분과 학문이며, 대체로 석굴사와 평지, 산지사찰로 양분할 수 있다. 그 가운데에서 불교조상을 비롯하여 벽화, 비각, 석등(經幢), 불교용품 등은 고대사, 건축사, 미술사, 철학종교사, 문헌학, 민족학, 과기고고, 문화교류사 등의 다양한 연구분야와 밀접한 관련을 가진다. 현재, 중국석굴사고고학의 연구는 비교적 체계적이고 독립적 영역을 확보하고 있으며 다양한 성과들을 제시하고 있다. 평지와 산지사찰유적에 대한 고고학적 연구가 상대적으로 미약하며 앞으로 발전과 제고(提高)가 필요하다.

지금부터 중국불교고고학의 조사와 발굴에 대한 회고, 주요 연구과제 및 그에 관련 문제및 전망 등의 세 부분으로 나누어 간략히 서술하고자 한다. 학계 여러분의 지도와 지적을 부탁드립니다.

(-) 석굴사고고학의 조사와 발굴

중국불교석굴은 인도에서 연원하며 기원 3세기에 출현하여 5세기에서 8세기까지 융성하였으며 대체로 16세기까지 축조되었다. 형태는 대부분 중심탑주가 있는 塔廟窟과 중심탑주가 없는 佛殿窟, 僧房窟, 대형불상이 조각된 大像窟, 불단이 설치되어 있는 佛壇窟, 소형의 禪窟 등으로 나눌 수 있다¹⁾.

중국석굴사에 대한 고고학적 조사는 20세기 초와 1949년 이전에 외국학자들의 조사와 발굴에서 시작하였다. 1893년에서 1931년까지는 영국의 스타

인, 독일의 그 베텔과 코크, 프랑스의 펠리오(Paul Pelliot), 스웨덴의 시렌(Osvald Siren), 미국의 워너(Landon · Warner) 등 중국의 서북지역인 신강, 내몽고, 감숙 등지에서 불교사찰과 석굴을 조사하였다. 니야(尼雅), 루란(楼兰), 미란(米兰), 단단우리크(丹丹乌里克), 热瓦克, 쿠차의 소파스(苏巴什), 두이두아-우쿠이(杜尔杜尔乌库尔), 투무쉬코(图木休克), 칠개성(七个星), 크제일(克孜尔), 베제클리크(伯孜克里克), 둔황(敦煌), 흑허(黑河) 등지의 불탑과 사찰유적을 조사하여 대량의 불교조각품, 벽화, 문서 등의 불교유물을 발굴하였다. 이러한 자료들은 서방에서 출판되었으며 특히, 스타인의 『古代和闐』(1907년), 『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년), 『西域考古记』(1921년), 펠리오의 『伯希和西域探险记』, 코크의 『高昌图录』 등이 서양 학자들에 의한 중국불교유적과 유물에 대한 연구열기를 일으키고 있다.

일본학자도 1902부터 1914년까지 大谷光瑞, 橘瑞超등에 의해 투루판(吐鲁番), 루란(楼兰), 쿠차(库车), 허토티(和田)지역의 불교사찰유적을 조사, 발굴하였으며 다량의 유물을 수집하였다. 1918년에서 1924년까지 常盘大定, 矢野贞은 중국 각지의 불교유적을 조사하였으며, 1925년에서 1939년 사이에는 『支那文化史迹』, 『支那佛教史迹』, 『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 등을 출판하였다. 1938년에서 1941년 사이에는 水野清一, 长广敏雄 등이 중국에서 조사, 발굴을 거쳐 1941년에 『响堂山石窟』을 출판하였으며, 1951년에는 『云冈石窟』 16권을 출판하였다.

중국학자들에 의한 조사도 진행되었다. 1918년 진원(陈垣)은 비교적 체계적으로 운강석굴을 조사하고 고증하여 『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를 발표하였다. 1932년에는 중국영조학사의 양사성 류둔정등이 운강석굴을 조사하여 『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北魏建筑』을 발표하였다.

1949년 중화인민공화국 성립부터 1969년까지는 중국석굴사고고학의 성립 시기에 해당한다. 북경대학교 고고학과와 阎文儒, 宿白등은 석굴사찰과 관련된 고고학 강의를 시작하여 석굴사고고학의 연구인력을 양성하였다. 아

올려 주요 석굴이 소재한 敦煌莫高窟, 云冈, 龙门, 克孜尔, 响堂山, 麦积山 등지에 연구원과 연구소, 보관소를 설립하여 전면적인 고고학조사(측량, 등록)와 발굴, 연구를 진행하였다. 甘肃성 永靖의 炳灵寺, 무위武威 천계산天梯山, 경양북庆阳北 및 산서陕西지역의 석굴사찰 등이 새로 발견되었다. 1957년과 1961년에 북경대학교 고고학과는 향당산响堂山과 둔황석굴에 대한 조사를 진행하였다. 1957년, 북경대학교 숙백교수는 둔황문물연구소에서 『敦煌七讲』을 통해 석굴사의 조사와 연구에 고고학적 연구방법론을 제시하여 중국석굴사고고학의 탄생을 알렸다.

1970년 이후에서 지금까지는 중국석굴사고고학은 발전과 번성기에 해당하며, 각 지역에서 고고학적 연구방법론에 의한 석굴사에 대한 발굴, 조사실측과 종합적인 연구가 이루어지고 있다²⁾.

1979년에서 1981년까지는 숙백에 의해 북경대학교 역사학과 석굴고고 조사팀이 新疆克孜尔석굴을 조사, 기록, 실측하였으며, 일부 석굴에 대해서는 발굴조사와 수습조사가 이루어져 1997년에 『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출판하였다. 이는 중국에서 출간된 최초의 석굴사찰에 대한 고고학 조사보고서이다.

1980년 이후, 북경대학교 고고학과는 영하(宁夏)의 固原须弥山석굴, 하북(河北)의 邯郸南响堂석굴, 河西走廊의 초기 석굴, 용문석굴, 麦积山석굴의 일부 동굴에 대한 측량과 조사를 실시 하였다.

1988년에서 1995년까지는 60년대에 이어 南區 殿堂유적의 발굴과 더불어 둔황연구원은 둔황막고굴 北區의 동굴 243기에 대해 전면적인 조사와 발굴을 진행하여 북구 동굴의 성격과 내용에 대한 새로운 인식을 제시하여, 승방굴(僧房窟), 禪窟(단실과 다실), 승방굴부설 선굴, 좌굴, 예불굴의 형태와 동굴의 개착은 중간 부분에서 시작하여 양 측면으로 진행하였음을 밝혔다. 발굴에 의해 북구의 동굴은 승려들의 생활, 거주, 수련의 공간이었으며 사후에는 매장 장소였음을 밝혔다. 이러한 동굴의 성격은 북조시기부터 원나라시

기까지 지속되었다. 2000년, 2004년을 전후하여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1, 2, 3 권을 출판되었다.

1989년에서 1990년까지 신장(新疆)의 문물관련 부서에서 克孜尔석굴의 谷西區에 위치한 일부 석굴의 窟前유적에 대해 발굴조사를 실시하여 동굴 30여기를 새로 발견하였으며, 일부 동굴의 교란관계를 통해 克孜尔석굴의 시기구분을 제시하였다.

1994년, 운강석굴보관소는 운강석굴 窟前유적을 부분 발굴하여 금동불상의 잔편과 건축유적 4기를 발굴하였다.

2002년에서 2006년 사이에 중국과학원 고고연구소와 산시성(山西省) 문물관이 연합 고고팀을 구성하여, 太原 서남쪽 용산(龙山)의 북쪽 봉우리에 서 북제시대에 창건되어 당대에 흥성한 동자사(童子寺)유적을 발굴하였다. 원락(院落), 월대, 본전, 불단, 석등, 승방 등의 유적이 조사되었으며, 본전은 정면 5칸에 중앙불단은 이미 훼손되었으나, 불단에 세운 석주 5기가 발견되었다. 팔각 석등의 몸체와 상부는 당대 유물로 확인되었다. 최근에도 다수의 대형 석불상이 발견되었다.

1999년, 新疆 库车縣에서 70km 떨어져 있는 克孜里亚대협곡에서 阿艾석굴이 새로이 발견되었으며 벽화와 漢文題記 등이 확인되었다³⁾.

2008년, 낙양 용문석굴연구원과 북경대학 文博學院이 연합으로 용문석굴의 擂鼓台석굴 窟前유적을 발굴조사하여 당대의 계단과 殿堂包石기단, 송대의 造像題記와 건축기초, 당송시기의 窟前도로유적을 발견하였다.

1949년이후 중국석굴사고고학의 발전은 『敦煌研究』, 『敦煌学辑刊』, 『吐鲁番学研究』, 『石窟寺研究』 등 학술간행물의 창간에서도 확인되며 연구자에게 전문적인 논문발표의 기반을 제공하였다. 아울러 다수 도록, 자료집, 논문집, 논저 등도 출판되었다. 특히, 숙백의 1996년 『中国石窟寺研究』와 2010년 『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은 가장 권위있는 저서로 손꼽힌다. 1980년 12월부터 일본 평범사(平凡社)는 중국문

물출판사와 합작하여 발간하는 『中国石窟』 시리즈 17권을 출판하고 있다. 발간순서에 따르면, 『敦煌莫高窟』 5권, 『巩县石窟寺』 1권, 『克孜尔石窟』 3권, 『库木吐石窟』 1권, 『永靖炳灵寺』 1권, 『天水麦积山』 1권, 『龙门石窟』 2권, 『云冈石窟』 2권, 『安西榆林窟』 1권이 출간되었다. 각 권은 도면이 대체로 192-300장 수록되며 논문이 2-5편, 도판설명, 연표와 실측도로 구성되어있다. 또한 각 석굴군의 내용 총록도 발표되었다. 또한,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 『中国壁画全集』, 『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 『龙门石窟总录』, 『须弥山石窟内容总录』, 『敦煌石窟全集』,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敦煌艺术品』의 출간은 관련 학술연구를 촉진시켰다.

대규모의 국제학술대회가 개최되어 학술대회논문도 출간되었다. 「1994年敦煌学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0年), 「龙门石窟一千五百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96年), 「炳灵寺石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年), 「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 「云冈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保护卷, 研究卷)(文物出版社, 2006年) 등이 출간되었다.

그 외에는 둔황연구원의 『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 난주대학교 둔황학연구소, 麦积山석굴예술연구소의 『天水麦积山石窟研究论文集』, 랴주대학교 둔황학연구소의 『永靖炳灵寺石窟研究文集』 등의 논문집도 출판되었다.

이상과 같은 다수의 도록과 학술논문집의 출판은 중국석굴사고고학 연구의 폭과 깊이를 반영하고 있다.

(二) 평지와 산지 불교사찰 유적의 고고조사와 발굴

상술한 바와 같이, 20세기 초 서방과 일본 탐험가들은 중국 新疆지역을 중심으로 불교사찰유적에 대한 조사와 발굴을 진행하였다.

비교적 이른 시기에 중국불교사찰유적을 조사한 중국학자는 황문빈으로 1927년, 1930년, 1943년에 걸쳐 3차례의 新疆塔里木盆地지역 불교사찰유적을 조사하였으며, 『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 『吐鲁番考古记』(1954, 1958),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 1958年), 『西北史地论丛』 등을 출간하였다.

1937년 건축사학자 梁思成과 林徽因, 莫宗江등은 산서성 오태산(五台山) 조사에서 당대 불광사 본전을 발견하였다. 또한 양사성과 류돈정은 운남, 사천 등지의 40여 개 현을 조사하여 고대 불교사찰과 고대건축을 조사하였으며, 다수의 고건축모형을 제작하여 영조학사의 간행물에 『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 『蓟县独乐寺山门考』, 『云岗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 등의 논문을 발표했다. 1944년 양사성은 『中国建筑史』를 집필하였다. 1949년 이후 평지와 산지사찰에 대한 고고학적 조사는 비록 체계적이지 않지만, 지속적인 발견과 발굴이 이루어져 영향을 미쳤다. 아래에서는 지역과 시대순서에 따라 서술하겠다.

1. 중원지역

(1) 佛寺塔基의 地宫, 탑 내부 天宫의 고고학 발견

1964년 이래, 전국적으로 불교사찰의 塔基 地宫과 탑 내부 天宫에서 사리가 봉안된 사리구와 공양품이 출토되었으며 이들은 대부분 명확한 기년을 가지고 있다. 구체적인 내용은 아래의 표와 같다. (지역 순서에 따라)

번호	발견지점	발견 시기	주요출토유적,유물	년대	비고
1	河北定縣城塔基	1964	石函、琉璃鉢、銅鉢和琉璃葫蘆瓶、七宝飾物珠寶	北魏 481年	《考古》66.5
2	河南洛陽北永宁寺塔基	1979	夯土塔基、豎穴方坑、泥塑像、珍珠、瑪瑙、水晶、象牙及銅錢等。	北魏熙平元年(526年)	《考古》81.3
3	陝西西安東效清禪寺隋舍利墓	1986	墓志、灰陶罐、供養珠寶飾物	大隋開皇9年(589年)	《考古与文物》88.1
4	山東平陰隋舍利宝塔石函	1982	石函蓋頂蓋刻“大隋皇帝舍利宝塔”、青玉殘板、北周“永通万国”、隋“五銖”錢	隋文帝仁壽年間(601~604年)	《考古》86.4
5	陝西耀州隋神德寺舍利塔基	1969	石函銘“大隋仁壽四年”(604年)、鎏金銅函、銅盒、鎏金銅函、琉璃瓶、銅瓶、金銀珠寶、波斯銀幣等	隋代	《考古》74.2
6	山西太原龍泉寺塔基地宮	2008	石函、鎏金銅飾木椁、木胎鎏金銅椁、木胎銀椁、金棺及“開元通宝”銅幣	武周時期	《2008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7	四川成都唐代塔基地宮	1980	石函、銅棺、銀罐、“五銖”錢	唐代	《考古与文物》83.3
8	江蘇句容行香寺隋代塔基	1975	地宮、鐵函、銅椁、銀椁、小銅棺	唐代早期	《考古》82.2
9	甘肅涇川唐代大云寺塔基地宮	1964	石函、鎏金銅函、銀椁、金棺、琉璃瓶、舍利、香料、織綉衬墊。	武周時期	《文物》66.3
10	陝西周至縣仙游寺法王塔	1988	塔身、地宮、發現石碑、石函、鎏金銅棺、舍利舍利塔下銘》，唐代的《仙游寺舍利塔銘》	唐代	《仙游寺隋唐塔銘兩種》王其禛，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11	河南登封法王寺塔基地宮		舍利盒、白釉細頸瓶、白釉双系罐、黑釉瓷壺等	晚唐	《2000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12	陝西臨潼唐代慶山寺塔基地宮	1985	地宮、“上方舍利塔記”碑、石雕舍利宝帳、銀椁金棺、兩瓷罽瓶、金、銀、銅、鐵、瓷、三彩、琉璃、開元通宝幣等	唐開元29年	《文博》86.5
13	陝西扶風法門寺塔基地宮	1987	放第一枚佛指的八重宝函；置第二枚佛指的漢白玉灵帳三重函棺；盛第三枚佛指的五重函棺；藏第四枚佛指的漢白玉阿育王塔三重塔棺。供養品有金銀器、秘色瓷、琉璃器、石雕、絲織品等	唐咸通15年(874年)	《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07年

번호	발견지점	발견 시기	주요출토유적,유물	년대	비고
14	山東惠民出土唐末五代定光佛舍利棺	1972	定光佛(燃灯佛)舍利棺, 石椁, 鐵棺, 數枚“開元通寶”錢	唐末	《文物》87.3
15	甘肅靈台五代舍利地宮	1957	石棺, 漆盒, 琉璃瓶, 墓志, 銅鏡	五代	《文物》83.2
16	浙江杭州雷峰塔基地宮	2000-2001	純銀阿育王塔(藏佛螺髻發舍利), 釋迦牟尼坐像, 鎏金銀器, 小型金銅造像, 石菩薩頭像, 銅鐵鏡, 鐵函, 玉觀音, 漆木器, 玻璃瓶, 絲織品, 銅幣, 石經, 五代紀年銘文磚遺物	五代	《2001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17	江蘇蘇州虎丘北宋云岩寺塔	1957	塔第二、三層發現天宮。“建隆二年”(961年)銘石函, 函內放經函, 內藏《法華經》, 珠飾, 香爐, 瓷碗等。第三層天宮石函內藏鐵鑄金涂地塔, 木質喇嘛塔, 舍利金瓶, 玉幢, 碗, 杯, 佛像, 像龕, 佛珠等	北宋	《蘇州虎丘塔出土文物》, 文物出版社8年
18	河北定縣兩座宋代塔基	1969	靜志寺塔基地宮: 銘文、題記, 知建于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出土北魏興安二年(453年)石函, 隋大業二年(606年)石函, 唐龍紀元年(889年)石棺, 金、銀珠飾等供養品。 淨衆院地宮: 石函刻“大宋至道元年”(995年)銘, 銀塔, 銀棺, 銀瓶, 石塔, 瓷瓶及銀、銅、瓷等供養具	北宋	《文物》72.8
19	河南密縣原法海寺旧址上, 發現了北宋塔基地宮	1966	上下重疊兩方形石函: 上層石函置三彩琉璃塔, 下層“咸平二年”(998年)銘石函, 有三彩琉璃方塔, 三彩琉璃舍利函, 瓷舍利盒, 銀舍利盒, 琉璃器, 銅佛像, 銅錢	北宋	《文物》72.8
20	江蘇蘇州宋瑞光寺舍利寺塔	1978	第三層天宮, 双重木函, 墨書“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銘, 內置“真珠舍利寶幢”, 琉璃葫蘆瓶, 經咒, 銀龍, 銅錢, 料石佛像, 佛塔, 漆函, 佛經, 印章等	北宋	《文物》79.11; 86.9
21	江蘇連云港海清寺北宋阿育王塔		塔竣于北宋天聖九年(1032年)。塔內第二層天宮中石函內置鐵函, 佛骨, 琉璃瓶, 銀椁, 銀盒, 葫蘆瓷瓶, 銀	北宋	《文物》81.7

번호	발견지점	발견 시기	주요출토유적,유물	년대	비고
			棺、銀函、琉璃瓶、木蓮座及水晶、 雄黃及錢幣等		
22	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	1966	出寫經、刻經、《經志》(慶曆三年 (1043年)入塔)、經袱、金涂塔、描金 堆漆舍利函、銀塔、銀瓶、銅錢、佛 像、琉璃瓶等	北宋	《文物》73.1
23	浙江金華北宋万佛塔塔基	1956	刻“嘉佑七年”(1062年)銘經幢。幢前放 鐵函、佛像、塔、盒、鏡、錢幣	北宋	《金華万佛塔出土 文物》,文物出版 社58年
24	上海松江北宋興教寺塔地宮	1974	北宋熙寧、元佑年間(1068—1093年) 所建。出土石函、唐宋銅錢、銅坐 佛、漆函、銅臥佛和大小銀函、銀 珠、沉香、佛牙、舍利子等	北宋	《考古》83.12
25	江蘇鎮江甘露寺宋代鐵塔地 宮	1960	石函內有唐李德裕年太和三年(829年) 銘石函、宋代銀函、銀盒、漆函、木 軸、銀牌、銀太子像、琉璃珠、絲織 品、銅錢等	唐宋	《考古》61.6
26	山東濟寧北宋鐵塔	1973	出北宋崇寧四年(1105年)鐵塔。第一 層天宮中置舍利石函、瓷函和木函及 銅佛、銅鏡、鐵牌、佛經、石碑	北宋	《文物》87.2
27	云南大理崇聖寺千尋塔	1979	塔頂中心出銅質方筒及東西兩側坑 洞。方筒內經幢中有兩銀塔,東坑中 舍利內函、鍍金銀塔。塔頂還出佛 像、佛經、塔模、金剛杵、印章、佛 珠、香料、銅錢等	大理國時期 (1000~1160年)	《考古學報》81.2
28	浙江麗水碧湖鎮南宋塔基地 宮	1960	出有佛經、銅佛、銅鏡、磚刻、碑 刻、琉璃珠、錢幣、瓷殘器及佛牙等	南宋	《文物》63.3
29	北京順義縣遼淨光舍利塔基	1963	塔基地宮石經幢上刻“開泰二年”(1013 年)銘。北部正中置銀圓盒5、琉璃 瓶、石志、淨瓶、罐、盒、盤、飾 物、佛塔、銅錢	遼	《文物》64.8
30	吉林農安万金鄉遼代塔基	1970	遼開泰年間(1012~1021年)塔基地宮。 地宮中置石塔、鐵塔、銅函、銀函 函	遼	《文物》73.8

번호	발견지점	발견 시기	주요출토유적,유물	년대	비고
			內裝舍利。地宮內木桌上有碗、碟、箸、匙、絲織殘片、水晶飾物、腊筒、木刻佛像、木蓮花及銅錢等		
31	內蒙古宁城武官營子遼塔地宮	1954	地宮頂石墨書“重熙十四年”(1045年)銘。地宮中石塔內依次套鐵函(朽)、銅函、鎏金銅函、銀函、琉璃罐。鎏金銅函內放琉璃瓶、玉飾、珠飾、銅佛及銅錢。函前石桌上置瓶、玉飾、珠飾、銅佛及銅錢	遼	《考古》64.11
32	北京房山北鄭村遼塔基地宮	1977	地宮中石函刻“重熙二十年”(1051年)銘。函內放石佛像、瓷碟、銅碗、匙、鏡、銀碗、碟、筋、佛幡、幡架、宝花和水晶珠及舍利。在地宮石板蓋上立石幢	遼	《考古》80.2
33	遼宁朝陽遼代北塔	1986	北塔地宮和天宮重建于重熙年間(1050~1055年)。地宮出石經幢,天宮中出有舍利金塔、瑪瑙、罐、佛骨。地宮和天宮中還出經塔、銀塔、銀菩提樹、琉璃瓶、瓷淨瓶、瓷盤、瑪瑙玉石龜及十二生肖	遼	《文物》92.7
34	天津薊縣獨樂寺遼塔天宮	1983	塔上層天宮出銅質管狀器、水晶罐和木葫蘆瓶,均藏舍利。天宮中“清宁四年”(1058年)銘舍利石函,天宮出碗、盤、碟、瓶、罐、盒、塔、金剛杵、鉢、如意、石宝飾物	遼	《考古學報》89.1
35	遼宁沈陽遼崇壽寺白塔	1956	第一層天宮中置石函、鐵函、瓷罐、小木塔、“乾統八年”(1108年)銘銅函、銅函、銀函、鎏金函;塔基地宮石函、鐵函、銅函、銀函、葫蘆瓷瓶、漢遼錢幣	遼	《文物參考資料》57.8; 《考古通訊》57.6
36	河北易縣遼淨覺寺舍利地宮	1977	宮室西壁記“天慶五年”(1115年)年号,出舍利銀塔、金瓶及碗、盤、碟、匕筋、瓶、盒、鉢、壺、熏爐、珠飾、漢宋錢幣等	遼	《文物》86.9

번호	발견지점	발견 시기	주요출토유적,유물	년대	비고
37	山西應縣遼佛宮寺木塔	1974	塔第二、四層主像凹槽內均發現銀盒、內盛七寶與佛牙。第四層主佛凹槽內放大量經卷	遼末金初	《文物》82.6
38	浙江崇德崇福寺西塔塔頂	1955	明代安放吳越金涂塔 塔內銀盒里藏舍利及金、銀、玉飾物、銅錢； 明正德九年(1515年)入藏有鑿花銀盒、七香、銅錢； 明天啓二年(1622年)佛龕內藏銅盒、金銀玉琥珀質佛像、珊瑚樹、玉花、銅鏡； 清嘉慶十年(1806)入藏錫盒、經卷、王母像、壽星像、佛像、花、羅漢珠、玉鳳、玉筆洗、硃砂、銅錢等	明、清	《文物參考資料》56.1
39	山東聊城鐵塔塔基地宮中明代舍利器具	1973	鐵塔北宋晚期建, 其地宮內發現明代重慶的石函、銀函及錢幣	明代	《考古》87.2
40	江蘇南京秦淮區中華門外、雨花路東側報恩寺塔基地宮	2007-2010	北宋大中祥符4年(1101年)所建、明代重建時沿用的塔基地宮中, 出土了鐵函、石函、銀符等。鐵函中七寶阿育王塔, 內藏“佛頂真骨”	明代永樂至宣德年間	《2008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2010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상기 표와 같이 섬서성 법문사, 절강성 항주 雷峰塔, 강소성 남경 대보은 사탑의 지궁에서 출토된 사리구는 모두 당대, 오대, 명대황실에서 공양한 사리와 사리기로 등급이 높고 공예가 정교하다. 이 발견은 사회적 강렬한 반응을 불러일으켰다.

(2) 佛像窖藏, 佛像群의 발견

최근 허북성 邳城, 曲阳, 하남성 洛阳, 섬서성 서안 등지에서 불상窖藏과 불상군이 지속적으로 발견되어 그 수량이 많아 본 고에서는 일일이 열거하지 않고 서안지역에서 출토된 돌제, 금동, 泥佛의 사례를 소개하고 자 한다⁴⁾.

序号	出土地点	出土時間	佛像種類數量	時代	備注
1	蓮湖區大士門村南	1957年	泥塑像、石像數百尊，部分造像刻有“大唐善業尼”	唐	金城坊開善尼寺遺址
2	西安東郊新城區電厂路龍華村北側	1959年	石像窖藏佛像10	唐	長樂坊大安國寺
3	未央區漢城街道辦事處范家堡	1971	佛和菩薩像3	北周	
4	未央區六村堡街道辦事處東席村	1973	菩薩像1、四面造像碑1	北周	
5	雁塔區小寨街道東八里村	1974年	鎏金銅佛座 刻“開皇四年”銘 上有佛1菩薩2獅2	隋	昌樂坊
6	未央區草灘街道辦事處李家街村	1975	佛龕像17	北周	
7	未央區六村堡街道辦事處中官亭村	1982	立佛像2、觀音立像(保定5年題記)1	北周	
8	洋鎬西路以南、勞動南路以西	1982、1986	石造像窖藏，附近出百件善業泥像	唐	禮泉寺
9	未央區未央宮辦事處大劉寨村西	1984	佛頭像2	北周	
10	蓮湖區空軍通訊學院		立佛像2	北周	
11	蓮湖區西稍門西北空軍通訊學院	1984等	出北朝、隋唐石像窖藏 出佛、菩薩石像32		金城坊樂善尼寺(溫國寺)
12	西安大南門外冉家村南	1985	窖藏坑石佛造像11	隋	崇義坊正覺寺
13	蓮湖區桃園街道辦事處原西安民航機場	1986	觀音像1、釋迦千佛造像碑1、佛頭2	北周	
14	未央區漢城街道辦事處西查村	1992	觀音像3	北周	
15	灊橋區紅旗街道辦事處灣子村	2004	立佛像5、佛座4	北周	
16	西安未央區中查村西北北周長安城宮城之南	2004	造像31件，包括立像、坐像、立菩薩像等	北周	《古都臨珍—長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文物出版社2010年

序号	出土地点	出土時間	佛像種類數量	時代	備注
17	未央區六村堡街道辦事處寶寨村	2007	佛像4、佛頭像2、菩薩像3、菩薩頭像1、殘佛座2	北周	

(3) 불교사찰유적

상기한 불탑지궁(地宮)과 불상군의 고고학 발견 외에도 불교사찰유적의 고고학 조사와 발굴은 점차 주목받고 있으며 최근 새로운 발견도 증가하고 있다.

1963년과 1979년에서 1981년까지 중국과학원고고연구소는 하남성 낙양시에 소재한 东汉, 魏시기 洛阳故城내의 永宁寺유적을 발굴, 조사하였다. 조사에 의하면, 사원의 평면은 장방형이며 남북 305m, 동서 260m이다. 탑의 기단은 사원의 중앙부에 위치하며 평면은 방형이고 기단 네 면은 靑石을 이용하여 축조하였으며 모두 계단을 설치하였다. 탑의 북쪽에는 비교적 넓은 판축의 기단유적이 남아 있으며 正殿으로 추정된다. 발굴조사를 통해 이는 중국 초기 불교사찰 전전후탑(前塔后殿) 배치의 전형적인 사례로 추정된다. 사찰에서는 다량의 석제 조각과 기와, 와당, 소조상의 잔편들이 출토되었다. 소조상의 잔편은 대형과 소형의 두 가지로 구분되는데 대형은 비교적 적고 대체로 佛과 보살상이다. 소형은 300여기가 출토되었으며 대부분은 벽면에 부착된 '影塑'이고, 대부분 비천, 보살, 비구 및 세속 공양인상, 높은 모자와 큰 신발을 착용하고 넓은 띠를 매고 있는 상류 인물 및 侍從. 文吏와 무사로 조형이 정교하며 생동감이 있다⁵⁾.

1981년 산시성 대동시 박물관은 대동시 동북의 方山 남쪽에서 북위시기 불사유적을 발굴하였다. 북위, 遼, 金, 明清시기의 문화층이 확인되었으며 북위시기의 山門, 회랑식 塔基, 불전, 선방 등이 발굴되었으며 북위시기 蓮

花化生와당을 비롯한 불상 잔편들이 출토되었다⁶⁾.

2010년 산서성 운강석굴연구원은 비교적 완전한 형태의 북위시기 사찰유적을 발견되어 北廊房, 东廊房, 西廊房, 南廊房, 塔基, 砖瓦甬유적이 발굴되었다. 2011년에는 사원에서 400m 떨어진 석굴의 상부에서 북위시기의 석조 구조의 塔基가 발견되었다. 불탑건축의 구조는 기초, 기단, 석탑하부건축의 3부분으로 구분된다. 塔基 평면은 정방형에 가까우며 남향이고 塔基의 4면에는 석제의 벽체를 축조하였다. 塔基의 남면에 동서방향의 동쪽 계단과 서쪽 계단이 각 하나씩 설치하였으며, 동, 서 방향으로 탑에 오를 수 있다. 석탑의 하부건축은 塔芯과 塔芯을 둘러싼 회랑의 두 부분으로 구성되어 있다. 塔身 정중앙에 상·하를 연결하는 찰주가 있다. 이러한 발굴조사의 내용은 북위시기 酈道元의 『水经注』에서 묘사된 운강석굴의 ‘山堂水殿, 煙寺相望’의 광경에 비견된다.

1996년 10월 산동성 청주(青州)의 용흥사(龙兴寺)에서 佛像窠藏이 발견되었다. 窠藏의 동서 길이는 8.6m, 남북 너비는 6.7m, 깊이는 3m에 이른다. 불상 400여 기가 출토되었으며 년대는 대부분 남북조 시기에 해당한다⁷⁾.

2002년 허북성 临漳县的 赵彭城邺城유적에서 북조시기의 佛寺塔基 유적이 발굴되었다. 이후 불탑 주변에 대한 발굴조사가 진행되어 2011-2012년에는 중심축선의 북쪽에서 대형의 건축유적과 東南院大型建築유적을 발굴하였다. 이를 통해 사찰의 가람배치에 대한 중요한 성과를 얻었으며 赵彭城의 북조시기 불사는 탑을 중심으로 중심축선에 대규모 전당식(殿堂式)건축을 축조한 다원락식(多院落式) 배치의 대규모 불사임이 증명되었다. 2012년 1월에는 업남성의 동곽성구(邺南城东郭城区)와 북오장촌(北吴庄村) 북쪽에서 대형의 불상매장갱이 발굴되었다. 출토된 불상의 수량이 2895기에 이르며 대부분 채회(彩绘)와 改金흔적이 확인되었으며 시기는 대체로 북위, 동위, 북제, 북주, 수당에 이른다. 지금까지 알려졌던 출토수량 최대의 불상매장갱이라고 볼 수 있다⁸⁾.

1997년부터 2000년까지 낙양시문화관리국, 용문석굴연구소는 이탈리아의 中遠東연구소, 나폴리대학교 동방문화연구소와 합작으로 낙양용문석굴 서쪽의 당대 奉先寺유적을 발굴조사 하였다. 발굴조사에서 전당지와 水道유적 및 자기와 석각조상등이 발견되었다⁹⁾.

2005년부터 2006년까지 四川省 成都市 邛崃县의 당송시기 龙兴寺유적이 발굴조사되었다. 주거지를 비롯하여 방형의 전담기단과 북송시기의 나한전, 우물, 불상갱, 무덤등의 유적이 조사되어 석각조상과 석등, ‘大中九年’(855년) 명의 천왕상, 석각경관, 유리부재, 도자기, 동경, 화폐 등이 대량으로 출토되었다¹⁰⁾.

1973년부터 1980년까지 중국과학원고고연구소는 서안시 철루묘촌(铁炉庙村)의 당대 밀교의 祖庭인 청룡사유적을 발굴조사하였다. 발굴을 통해, 동서병렬의 庭院 두 개 및 사원의 북대문이 발굴조사되었다. 서쪽에 있는 庭院은 회랑을 갖춘 搭院구조로 中三門, 목탑, 불전 및 4면 회랑의 구조이며, 東院에서는 초기와 말기의 전당지가 발굴조사되었다. 전당지 주망갱(柱网坑)의 배열은 매우 정연하였다¹¹⁾.

1985년과 1992년 중국과학원고고연구소는 서안시 비림구 백묘촌(西安市碑林区白庙村)에서 당장안성의 유명사찰인 서명사(西明寺)유적을 발굴조사 하였다. 두 차례의 발굴조사를 통해 만 평방미터 유적이 조사되어 사찰 동부의 정원 3개로 구성된 편원(偏院)유적이 확인되었으며 前院의 前殿, 中殿, 北殿, 4면회랑의 담장, 정원, 水道滲井, 도로를 비롯하여 남부중앙의 夾道등이 확인되었다. 석등을 비롯하여 금동불상, 석불상, 陶佛像, 비각의 잔편, 석제 차연(石茶碾), 자기 완(瓷碗), 자기 柱子, 벼루, 玻璃鱼饰 및 ‘건원중보’(乾元重宝), ‘개원통보’(开元通宝)등의 화폐유물들이 출토되었다¹²⁾.

2011년부터, 내몽고문화고고연구소는 중국사회과학원 고고연구소 내몽고 2팀과 공동으로 요상경연합발굴대를 구성하여 내몽고 적봉시 과림좌기 임동진 동남쪽에 위치한 요상경 황성의 서산파(西山坡) 사원유적을 발굴조사 하

였다. 사원은 장방형院落형태로 4면은 담장이며 중심축선에는 대규모의 육각형 博木혼합구조의 불전과 좌우대칭으로 배치된 소형의 육각형전탑, 대전 앞의 소형 건축유적과 광장이 확인되었다. 유적에서는 소조 인면상(贴金泥塑人面像)을 비롯하여 석상(石像), 부도(石经幢), 동경, 철기, 도자기 등의 유물들이 다량으로 출토되어 遼代의 고고학, 역사, 불교, 건축연구에 중요한 실물자료들을 제공해 주고 있다¹³⁾.

2. 변방(边疆)지역

1957년 황문빈(黄文弼)은 제4차 신장(新疆)조사에서 古城과 사원유적을 조사하였으며 고고연구소에 의해 자료가 정리되어 1983년 『신장고고발굴 보고서』가 출간되었다.

1963년과 1964년에는 중국과학원고고연구소에 의해 黑龙江 宁安市 渤海镇에 위치한 발해시기 상경 용천부龙泉府유적이 발굴조사되어 1-9호로 명명된 불교사원 9곳이 확인되었다. 조사 내용에 의하면, 동서서쪽에서 첫째 열, 북쪽에서 두번째 방(坊) 서쪽의 1호 불교사찰이 가장 규모가 크며 본전, 穿廊과 동, 서실 3부분으로 구성되어 ‘ㄷ’자형의 전각과 같이 형태이며 3부분의 기단은 서로 연결되어 있다. 主殿의 동서 길이는 23.68m, 남북 길이는 20m이다. 도성 밖 북쪽에 위치하는 9호사원은 장방형의 독립적인 불전으로 정면 5칸, 측면 4칸에 외부는 회랑구조이며 전각 내부의 中心坛座는 减柱형식이다¹⁴⁾.

1959년과 1986년에는 숙백에 의해 2차례에 걸쳐 티베트의 라사, 山南, 日喀则、江孜지역에 대한 조사가 이루어졌다. 그는 조사된 기록과 도면들을 고고유형학적 방법론에 의거하여 티베트 불교사찰의 평면 배치와 分期연구를 진행하였다. 이후 그는 「西藏拉萨地区佛寺调查记」, 「西藏山南地区

佛寺调查记」, 「西藏日喀则地区寺庙调查记」 등의 연구논문을 발표하였으며 1996년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를 출간하여 티베트불교고고연구의 기초를 다졌다.

1985년 국가문물국은 티베트阿里지역에 대한 문물조사를 실시하였으며 집중적인 연구대상은 古格王國시기 도성인 札不讓을 중심으로 古格시기 건축 유적에 집중되었다. 조사성과는 1991년 출판된 《古格故城》에 수록되었다.

2005년부터 2007년까지 섬서성 고고연구소와 티베트 문물보호연구소는 티베트 薩迦寺의 北寺유적에 대한 전면적인 조사와 일부 구간에 대한 발굴 조사를 실시하였다. 薩迦南寺羊馬城의 성벽 및 해자, 北寺의 得确頗章유적, 烏孜大殿유적 및 塔林의 일부 塔基에 대한 발굴조사를 진행하였다. 또한, 薩迦北寺의 건축유적인 桑阿德吉林、东热布拉克康유적에 대한 현지조사와 발굴조사가 진행되었다¹⁵⁾.

新疆樓兰、尼雅、交河故城등 실크로드상의 대규모유적에서 대부분 불교 건축유적이 발견되었으며 주로 “木骨泥牆法”에 의해 불탑, 사찰, 불당과 불단의 4가지 유형이 축조되었다.

1995년 신장문물고고연구소와 일본의 관련기구는 중일 尼雅유적학술고찰대를 조직하여 신장民丰县 사막에서 위진시기의 尼雅불교사원유적을 조사하였다. 사원 남쪽에는 불전(FS)이 위치하며, 서쪽에는 선방과 강경당(FD)이 있으며 북쪽에는 회랑을 갖춘 주거지가 있다. 중앙은 약 500㎡면적의 광장이 위치하며 불전, 선방, 강경당으로 구성된 완전한 불교사원이다. 사원유적에서는 목조천인상을 비롯하여 부처와 보살상이 그려진 벽화의 잔편들이 출토되었다¹⁶⁾.

1993년 신강성 문물고고연구소와 프랑스로학연구중심 135연구소는 和田县북쪽 약 200㎡ 지점의 사막에서 喀拉墩 위진시기 불전유적 2기(N61, N62)를 발굴하였다. 벽체는 모두 “木骨泥牆法”으로 축조되었으며 전체 평면은 “回”자형으로 내부는 정방형 佛座기단과 4면은 통로로 이루어져 있

으며 내외 벽체간의 거리는 2m이다. 立佛과 坐佛의 벽화 잔편들이 출토되었다¹⁷⁾.

2002년 10월 신장성 문물국, 신장성 문물고고연구소와 일본불교대학 尼雅유적 학술연구기구가 공동으로 策勒县城 북쪽 약 90m² 지점의 사막에서 불교사원유적(CD4)을 발굴하였다. 사원의 평면구조는 장방형이며 남북 길이는 8.2m, 동서 너비는 6.02m이다. 벽체는 “木骨泥牆法”으로 축조되었으며 불상과 騎士 등의 벽화 잔편과 墨迹, 婆罗谜文题迹 등이 출토되었다. 이 사원의 배치형태는 克里雅河喀拉墩 부근의 사원유적과 동일하고 초축년대는 5세기이고 8세기 吐蕃의 于阗점령시기까지 사용되었다¹⁸⁾.

2002년부터 2006년까지 중국사회과학원고고연구소는 신장 策勒县 达玛沟乡 동남 약 7m²지점의 砂丘에서 托普鲁克墩불교사원유적을 발굴하였다. 1호 유적은 소형의 불당유적이며, 남향으로 평면형태는 장방형이며 남북 길이는 2m, 동서너비는 1.7m이다. 불당 안 북쪽 벽에 붙어있는 覆蓮기단위에 소조불상이 위치하며 잔존 높이는 1.45m이다. 4면의 벽체에는 다량의 입불, 좌불, 보살 등의 벽화가 남아있다. 2호 유적은 동향으로 “回”자형의 불당구조이다. 내부는 土坯를 사용하여 축조한 방형의 소조불상과 기단이 있다. 불당의 동쪽과 북쪽에는 각각 장방형의 측면 불당이 있으며 불두와 천불벽화의 잔편, 비로자나불 목관화, 찰주, 擦擦, 五铢錢과 开元通宝등이 출토되었다. 건축년대는 개원연간(713-741년)으로 추정된다. 2006년 达玛沟喀拉墩 1호 불교유적에 대한 소규모 발굴이 진행되었으며 불두, 천수천안관음, 보살의 머리, 소형 좌불의 벽화잔편이 출토되었다. 또한, 광배부분의 벽화 잔편과 권초문 벽화잔편등이 출토되었으며 처음 축조시기는 7세기로 비정된다¹⁹⁾.

1979년 중국사회과학원 고고연구소는 신장 吉木萨尔县 北庭古城의 서쪽에 위치한 高昌回鹘불교사원유적을 발굴하였다. 사원의 남쪽면과 동쪽면을 발굴조사하였으며 사원의 평면배치와 구조가 확인되었다. 사원의 평면형태

는 장방형이며 바닥은 관측기단으로 지상은 모두 土坯를 이용하여 축조하였다. 전체 유적은 남북 두 부분으로 구성되며 남쪽은 庭院, 配殿, 선방, 창고 등의 건축군이다. 북쪽은 잔존 높이 14.3m의 정전이며 4면은 동굴이 에워싸고 있다. 불전 밖의 남면 상부에는 洞龕이 있으며 동쪽, 북쪽, 서쪽의 3면 외벽에는 모두 2층의 佛洞龕이 위치한다. 불전의 내부에는 불단을 설치하여 불, 보살, 천왕, 나한상을 모시고 있으며 거대한 열반상도 하나 확인되었다.

소조상은 당시에는 개금을 한 것으로 추정된다. 回鶻文題記에 “神聖의亦都护”와 “长史”, “公主”의 명문이 확인되는데, 이는 사원의 위상과 왕실과의 관계를 보여준다. 이 불교사원유적의 사용연대는 대체로 10세기 중반에서 13세기 중반으로 추정된다.²⁰⁾

二

중국불교는 유구한 역사를 가지고 있으며, 유적과 유물이 매우 풍부하다. 건축을 비롯하여 조상, 벽화, 문헌불경 등은 모두 연구의 대상이며 또한 중국불교고고학연구의 대상 폭과 어려움을 보여준다. 최근 중국불교고고학 영역에서 발표된 관련 논문들은 다양한 영역을 포괄하고 있어 단편적인 내용으로는 전체를 포괄하기 어려운 점이 있다.

(一) 석굴사고고학의 연구방법의 개선

석굴사에 대한 고고학적 조사연구방법은 과거에는 주로 유형학적 방법론을 사용하여 대조, 분류, 조합의 연구를 진행하였다. 그러나 1980년대부터 숙백선생을 중심으로 과거의 방법론에 대한 성찰과 새로운 모색이 시도되었

다. 먼저 층위학적 방법론을 석굴사원의 조사와 연구에서 응용하여 석굴 불감의 선후관계, 조상, 장식문양을 비롯하여 채색화의 교란관계를 분석하고 귀납하여 년대의 선후관계에 대한 신뢰할 수 있는 결론을 도출하였다. 그러나 교란관계와 문화층의 선후관계는 상반관계이다. 즉 후기동굴에서는 초기의 조상이 존재할 수 없으며 다만 초기의 遺風으로 남아있는 것으로 이해할 수 있다. 초기동굴에서는 후기의 補刻된 조각이 존재한다. 이는 운강석굴을 비롯한 석굴 연구에서 모두 응용되고 있다²¹⁾. 다음으로 석굴사연구에서의 발굴조사의 중요성에 대한 인식이다. 지층에 대한 발굴을 통해 운강석굴에서 북위, 당, 요금시기의 窟檐건축유적이 확인되었으며 龙门석굴 擂鼓台的 窟前유적에서 당대의 계단을 비롯하여 窟前殿堂의 포석기단, 송대의 造像題記 및 당송시기의 도로등이 확인되었다. 이러한 성과들은 석굴사의 연혁과 분기, 시대구분에 모두 중요한 의미를 가지고 있다.

(二) 塔基 地窟과 사리매장방식의 연구

현재까지 중국에서 발굴된 불교사찰의 塔基는 상당수에 이른다. 주로 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塔基、河南洛阳北魏故城永宁寺塔址、河北临漳县东魏北齐佛寺塔址、河北定县隋静志寺塔基、陕西耀县隋神德寺舍利塔基、陕西周至仙游寺法王塔、陕西西安隋唐青龙寺塔址、陕西扶风唐法门寺塔址、陕西临潼唐庆山寺塔基、甘肃云泾大云寺塔基、山西太原市太山唐龙泉寺塔基 등이 발견되어 연구자들의 관심과 연구를 불러일으켰다. 그 가운데 서평방 선생의 연구가 가장 권위 있는 연구업적에 속한다. 그는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의 관련 항목과 《中国舍利塔基考述》의 논문에서 1982년 이전의 중국사리탑기관련 고고학 자료를 광범위하게 수집하여 체계적인 분석을 시도하여 중국사리탑기 및 사리매장기구의

변화양상을 규명하였다. 그의 연구에 의하면 불탑은 심주 중심의 목탑에서 누각식, 혹은 密檐式 博塔으로 변화하는 과정에서 博石函과 유리병의 사용에서 地宮과 金棺銀槨으로 사리의 매장방식이 변화하였음을 제시하였다.²²⁾ 또한, 최근에는 일부 연구자들에 의해 서평방선생의 관점이 보충되기도 하였다.²³⁾ 특히 최근 불탑답기의 새로운 발견들은 기존 관점을 증명하여 주고 있다.

(三) 불교사원의 가람배치 연구

중국에서 발견된 불교사원유적은 손에 꼽힐 정도이며 대체로 山西大同北魏方山思远浮图遗址, 河南洛阳北魏故城永宁寺遗址, 河北临漳县邺城东魏北齐佛寺遗址, 陕西西安隋唐青龙寺遗址, 陕西西安唐西明寺遗址, 河南洛阳唐奉先寺遗址 등이 있다. 이러한 유적들은 平城思远浮图 외에는 모두 일부분만이 발굴되었으며 대부분이 도성유적의 내부와 주변에서 위치한다.

1997년 숙백선생은 고고학자료에 근거하여 《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 《隋代佛寺布局》의 두 논문을 발표하여 隋代 및 수대이전 불교사찰 가람배치에 대한 체계적인 연구를 시도하였다. 그는 5세기 북위의 낙양천도 이전 불교사원은 탑을 중심으로 강당, 선방등이 출현한다고 주장하였다. 아울러 5세기에서 남북조의 멸망까지 일반적인 불교사원은 여전히 탑을 중심으로 불탑이 불전의 전방에 위치하지만, 황실사원의 경우에는 別院山池 등이 출현한다고 주장하였다. 수대의 불교사원은 여전히 앞 시기의 불탑 중심의 전통적인 가람배치를 답습하고 있음을 주장하였다²⁴⁾.

당대에는 불교사원이 매우 발달하여 불교사원의 배치형태와 관련하여 연구자들은 발굴자료와 돈황벽화, 문헌자료들을 종합하여 당대 불교사원의 가람배치가 이미 불전 중심으로 전환되었음을 제시하였으며 아울러 불탑이 부

차적인 지위의 多院落형식으로 전환되었음을 제기하였다²⁵⁾.

당대이후의 불교사원은 선종의 성행으로 선종사찰의 비중이 높아지면서 가람배치에서도 새로운 변화가 출현하여 伽藍七堂의 배치형태가 주류를 형성한다²⁶⁾.

(四) 장강유역의 기물에서 발견되는 불교도상과 불교의 남방전래에 대한 고찰과 연구

1991년부터 중국 남경예술학원, 북경대학교, 남경박물관, 일본 용곡대학은 공동으로 “초전불교의 남방루트“ 과제를 추진하면서 연구팀은 모두 5차에 걸쳐 장강유역에 따라 四川, 湖南, 湖北, 江苏, 广东 등의 10개 성, 시, 지역을 대상으로 “초기불교조상의 남방전래“의 현장조사와 고찰을 진행하였다. 이후, 조사내용에 기초하여 《佛敎初傳南方之路》 출간하였는데, 이 도록에는 반세기에 걸쳐 발견된 불상조형과 관련한 고고학 유적들이 수록되었다. 소개된 유물들은 대부분 다른 불교조형물에 조각되거나 그려진 (불교조형에 슬픔: 애묘부조의 석가불상, 搖錢樹插座、銅錢樹, 동한말기에서 위진시기의 화상석묘, 금동장식품, 동경, 陶瓷谷倉罐, 즉 魂瓶, 청자器具, 장강상류 사천지역에서 볼 수 있는 錢樹 및 애묘석각의 불상, 장강중류에서 출토된 유물에서 확인되는 靑銅器, 즉 동경, 魂瓶의 불상은 장강하류의 절강지역 일대에서만 볼 수 있다. 이러한 차이는 지역적인 차이)불상형상들이다. 그러나 이는 이후의 완전한 불교적 의미의 독립한 불교조상과는 구분된다. 단지 불교적 함의를 내포한 형상으로 이해할 수 있으므로 佛의 형상으로 지칭되는 것이 합당하리라 생각된다. 이러한 조형은 남방에서만 확인되고 있으며 대부분은 장강유역에서 발견되고 시기는 대체로 2-4세기에 속한다. 같은 시기의 북방에서는 비슷한 예술품이 거의 발견되지 않았다. 그래서 이러한 불교

예술품이 불교가 초기 중국 전파의 관계는 남방과 북방, 해상과 대륙 초기불교가 중국에 전파된 과정에서의 지위와 역할 등의 문제도 나타났다. 불교가 초기에 전파된 시기, 남방과 서역은 다른 방식을 통하여 각각의 전파 방식에 따라 최초의 불교전파 근거지가 형성되었으며, 불교의 메시지가 중원에 전파되었다. 따라서 불교가 중국에 전파되는 방법은 다원적이고, 대륙과 해상은 초기불교가 중국에 전파되는 과정에서 그의 지위와 역할은 똑같다.²⁷⁾

(五) 석굴, 불상양식과 예술적 특징에 대한 연구

석굴양식과 예술적 특징의 계승과 변천과정과 관련하여 숙백선생은 《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의 2편의 논문을 발표하였다. 전자에서는 1994년 天梯山석굴의 현지조사자료를 통해 중국석굴이 天梯山석굴의 제1굴과 제4굴에서 기원하였음을 입증하였다. 즉 초기의 北凉시기 동굴 또는 凉州석굴유적에 해당한다. 北凉 沮渠蒙遜이 개착한 天梯山석굴이 바로 凉州석굴이며 이를 통해, "凉州模式"이 성립되었다 (十六國시기 凉州는 불교문화의 중심지 이다).

曇曜五窟을 포함한 운강석굴의 21개 주요 동굴은 凉州 및 龟兹불교의 遺風을 가지고 있다. 또한, 운강석굴을 모방한 용문석굴도 凉州석굴의 양식에서 벗어나지 않는다. 후자의 논문에는 운강석굴이 인도, 중앙아시아 등 여러 불교조상의 예술적 특징이 조합되어 성립된 것이며 이를 통해, "중국화"가 시작되었음을 주장하였다. 중기 석굴에서 출현하는 중국식 궁전건축양식의 조각, 중국식 佛像龕, 중국식 건축장식 등은 중국불교예술발전의 전환점이 된 "운강모식"이 형성되었음을 보여준다. 돈황 막고굴과 용문석굴의 복위시기 조상은 대부분 운강석굴의 영향을 받았다²⁸⁾.

불상의 예술적 특징과 관련하여 숙백선생은 1999년 《青州城考略——青

州城与龙兴寺之一》, 《龙兴寺沿革——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二》와 《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三》을 발표하였다. 이 3편의 논문에서 용흥사조상의 예술적 특징은 동위 말기와 북제시기의 급격히 변화에 원인한 것임을 지적하였다. "褒衣博带式복식과 구분되는 불교조상의 점진적 출현"으로 얇고 투명한 법의를 입은 불상은 靑州風格의 다른 측면을 구현한 것이라 지적하였다. 이러한 예술적 특징을 가진 불상은 상투가 살짝 나오고, 두 눈이 밑을 바라보고, 몸체가 날씬하고, 아름답고, 어깨가 납작하고 넓다. 가슴은 살짝 나오며, 배가 살짝 나오고 허리는 날씬하고, 복식이 가볍고 얇아 몸에 붙어 있으므로 "曹衣出水"의 효과가 잘 구현되었다. 보살상도 이와 같다. 이러한 "靑州風格"은 주로 북제시기에 유행하였다²⁹⁾.

金维诺선생은 "曹家样"이 중앙아시아의 소구트(粟特)에서 기원하였으며 옷이 얇고 투명하고 "出水"와 동일한 양식으로 이해하였다. 河北曲阳修德寺, 山东靑州龙兴寺에서 출토된 북조시 초기조상은 비교적 전형적인 "秀骨清像式"으로 "靑州样式", 혹은 "薄衣式佛像"으로 지칭된다. 표면이 매끈하고 선각이 간결하며 눈빛이 침착하고 자상하여 내재된 정신이 다양하다³⁰⁾. 상술한 불상양식과 예술적 특징은 이 방면의 연구에 고리를 제공한다.

(六) 능묘불사유적의 연구

陵寺의 토론은 새로운 과제이다. 가장 먼저 능사에 주목하여 연구를 진행한 연구자는 白文固이다. 그는 《宋代的功德寺和坟寺》에서 "陵寺는 황능 옆의 사찰"임을 밝혔다. 북송시기황능 부근에는 모두 陵寺를 건설하였으며 이미 제도도 형성되었다. 이는 위진남북조시기까지 그 연원을 찾을 수 있다³¹⁾.

이후 冉万里는 중국고대陵寺제도에 대해 체계적으로 정리하여 당대의 陵寺를 고증하였다. 그는 "중국고대왕릉의 능사제도는 그 연원을 남북조시기에서 찾을 수 있으며 수당시기에 발전하여 북송시기에 성숙"하였다는 관점

을 제시하였다. 북위 永固陵 앞에 위치한 思遠佛寺는 초기의 陵寺이다. 陵寺는 황제능원 부근에 건립한 사원으로 황제릉의 부속 건축물이다. 일반적으로 건립지는 대부분 후대 황제 또는 황실성원이며 일정한 목적이나 전통적 관습으로 전대의 황제를 위해 능사를 축조하거나 황제 본인이 황후를 위해 건립한 건물이기도 하다. 陵寺의 특수한 지리적 환경으로 인해 그 위상이 모두 높아 황실사찰에 속한다³²⁾. 張建林선생은 당대상장습관에 대한 연구에서 당대의 陵寺에 대해서도 다루고 있다³³⁾.

田有前은 당대昭陵부근에 위치한 瑶台寺와 高宗时期의 河北祖陵 부근의 光业寺, 中宗定陵附近의 定陵寺유적을 조사하고 건립년대, 위치, 기능에 대해 서술하였다. 陵寺에 대한 고고학적 연구는 중국왕릉고고학 연구에서 중요한 역할을 담당하고 있으며 이후의 중요한 연구과제로는 역대 陵寺제도의 변화, 陵寺구역의 기본배치와 유적, 석각의 분포와 보존현황에 대한 문제등을 들 수 있다³⁴⁾.

(七) 불교석경에 대한 고고연구

북제시기부터 명대까지 산둥, 하남, 허북, 산시, 사천, 중경 등지의 불교도들은 산의 절벽과 비석에 대규모의 불경을 다수 조각하여 후대에 귀한 문화자산을 남겨주었다.

1957년 房山云居寺의 石經에 대한 발굴조사가 진행되어 석경연구를 시작을 알렸다³⁵⁾. 1978년 숙백선생은 제1기 석굴사고고 연구생에게 "佛典板本目錄"의 강의를 개설하여 房山云居寺석경을 포함하고 직접 현지조사를 실시하였다.

이후, 독일 海德堡대학 雷德侯교수를 위시한 학술단은 중국학자들과 공동으로 각 지방에 산재한 석경에 대한 광범위한 조사를 진행하고 고고학과 미술사의 연구방법을 종합적으로 적용하여 25년간 연구가 진행되었다. 그동안

여러 차례에 걸쳐 국제학술대회를 개최하여 석경의 연구를 중국불교고고학 연구 중요한 내용으로 삼았다³⁶⁾.

결론

상기 내용을 종합하면 최근 중국불교고고학은 다양한 연구성과를 도출하였지만 많은 문제점도 남겨두고 있다. 석굴사의 分區, 分期는 더욱 전면적으로 진행되어야 할 과제이다. 단일 지역 안 밖의 석굴사 사이의 관계와 석굴사에 대한 종합적인 연구가 비교적 미약하다. 불사유적은 대부분 배치형태만이 발굴조사되었으며 전면적인 발굴조사가 진행된 불사유적은 거의 없다. 불사유적에 대한 고고학 보고서도 많이 부족하여 연구자의 수요를 만족시키지 못하고 있다. 유구한 중국역사에 비해 불사유적이 많지 않은 점도 지적할 수 있다. 국내의 불사에 대한 비교연구도 매우 산발적으로 진행되고 있다. 불교종파와 불사의 형식에 관한 연구도 아직 규명되지 않고 있다. 불사와 도시, 鄉鎮과의 관계에 대한 연구도 과제로 남겨져 있다.

미래에 대한 전망에서 우리는 중국불교고고학의 발전에 대해 충만한 자신감을 가지고 있다. 먼저, 선배들의 노력으로 이룩한 중국불교고고학의 체계가 이미 형성되었으며 효과적인 이론과 연구방법론이 모색되고 있어 중국 고고학의 분과학문으로 자리매김하고 있다. 두 번째로 수십 년의 노력에 의해 비교적 풍부한 고고자료가 이미 축적되어 이와 관련된 연구의 필요조건이 제공되고 있다. 세 번째로 청년층과 중장년층으로 구성된 전문적인 연구 그룹이 형성되면서 학술교류의 공간이 만들어 졌다. 일부 청년연구자들은 이미 다양한 연구분야에서 중요한 학술적 위치를 맡아 과학연구의 주역이 되고 있다. 중국경제의 발전은 이와 관련한 시설과 연구경비의 지원에 뒷받침이 되고 있다. 최근 불교유적에 대한 고고학조사는 한층 더 학계와 사회

의 관심과 주목을 받고 있으며 조사와 발굴의 유적도 증가되면서 불교고고학의 발전을 견인하고 있다. 관련연구는 더욱 세분화, 체계화, 과학화되고 있어 중국불교고고학의 발전의 전망은 낙관적이라 할 수 있다.

-
- 1) 国家文物局编：《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
 - 2) 李裕群《古代石窟寺》，文物出版社，2003年。
 - 3) 盛春寿等：《阿艾石窟》，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
 - 4) 《表一，西安出土北周石刻佛教造像统计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古都遗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文物出版社2010年；《表二，隋唐长安城佛寺遗存一览》，龚国强：《隋唐长安佛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
 - 6) 大同市博物馆胡平：《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2007年4期。
 - 7) 夏名采《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魏北齐佛寺塔基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3年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0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12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及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中国文物信息网2013年03月28日。
 - 9) 刘景龙、李永强：《洛阳龙门奉先寺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1年2期。
 - 1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邛崃市文物管理局：《四川邛崃龙兴寺-2005-2006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青龙寺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2期。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期。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考古》2013年 第1期。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六顶山与渤海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 15) 《西藏萨迦寺考古发掘再获重要成果》，《2007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2008年。
 - 16) 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卷2，中村印刷株式会社，1999年；张铁男、王宗磊：《95年尼雅遗址93A35佛教寺院发掘简报》、《1996年尼雅93A35号遗址中FA、FB、FC、FD发掘简报》，分别载于《新疆文物》1998年第1期、1999年第2期。

- 17) 中法联合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考察概述》，《考古》1999年第7期。
- 18) 中国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年；刘国瑞、屈涛、张玉忠：《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新发现的佛寺壁画》，《西域研究》2005年4期；盛春寿、李军、张铁男等：《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新发现的佛寺壁画》，《边疆考古研究》第七辑，2008年。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7年第4期。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年。
- 21) 杭侃：《云冈第二十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文物》1994年10期。
- 22) 徐萃芳：《中国舍利塔基考述》，《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北允晨文化1995年。
- 23) 杨泓：《法门寺塔基发掘与中国古代舍利瘞埋制度》，《文物》1988年10期。
- 24) 宿白：《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宿白：《隋代佛寺布局》，《考古与文物》1997年2期。
- 25) 萧默：《敦煌建筑研究》，文物出版，1989年；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梁思成文集》（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龚国强：《隋唐长安佛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周绍良主编：《梵宫——中国佛教建筑艺术》，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 26) 戴俭：《禅宗寺院建筑布局初探》，台北明文书局1990年。
- 27) 梁白泉等：《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出版社，1993年；阮荣春：《佛教南传之路》，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 28) 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
- 29) 宿白：《青州城考略——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一》，《文物》1999年第8期；《龙兴寺沿革——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二》，《文物》1999年第9期；《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三》，《文物》1999年第10期。
- 30) 金维诺：《中国古代佛雕：佛造像样式与风格》，文物出版社2002年。
- 31) 白文固：《宋代的功德寺和坟寺》，《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5期。
- 32) 冉万里：《帝陵建寺之制考略》，《西部考古》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
- 33) 张建林：《唐代丧葬习俗中佛教因素的考古学考察》，《西部考古》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
- 34) 田有前：《唐代陵寺考》，《文博》2010年第4期。
- 35) 中国佛教协会编：《房山云居寺石经》，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 36) 罗绍：《中国佛教考古学的开创者——宿白先生九秩华诞献词》，《石窟寺研究》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12年。